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每份售五百元·

第一卷　第八期

專論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吳世昌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伍啓元

戰從義．政從仁　純青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中）　胡先驌

敎育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觀察通信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皖中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蘭州秋色（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悲劇世界之變遷　宗白華

尾頁

三峽行·引退的風度·關于新疆·貧生偶記·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本刊出版一月半·銷行已達九千份

直接定戶已達千餘人

創刊號再版 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

全國知名學者教授六十餘人執筆

銷行遠至 康定 西寧 包頭 長春 蒙自 邕寧 海南島 新加坡 東京

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illegible]·

·本刊一至七期目錄·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王芸生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伍啓元
失敗的統治	儲安平
誰能替人民說話	吳世昌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說民主	蕭公權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	楊西孟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防線	張印堂
中美英蘇之關係	胡先驌
糧食的國際分配（華盛頓通信）	陳之邁
戰敗後的日本（東京通信）	味橡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紐約通信）	楊剛
論知行	馮友蘭
再論知行	馮友蘭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潘光旦
時代的分析	陳友松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伍啓元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吳恩裕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俠文
思想之改造	胡先驌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簡貫三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從對比到統一（科學）	高覺敷
社會性的統一（科學）	高覺敷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科學）	戴文賽
牛郎織女（科學）	戴文賽
林溪與地球（科學）	蔡壬侯
山水·人物·藝術（文藝）	卞之琳
論排場戲（文藝）	陳瘦竹
文學的價值（文藝）	李廣田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文藝）	陳瘦竹
莎士比亞十四行（文藝）	戴鎦齡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文藝）	宗白華
山行野記（文藝）	卞之琳
未了知之人類（書評）	胡先驌
英國司法制度（書評）	李浩培

觀察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分別撰寄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李聞之死·沉默中的潘光旦

山雲多幻變柳暗花不明·錢昌照的擔負·清查團在天津

宋子文的政策政績作風資本·重歸英國懷抱後的香港

張治中獨鎮西陲·一個非洲森林中黯夜的鳥獸尋覓者

赫契生穆懿爾鄒秉文沈宗瀚的中國農業觀

西南聯大化整為零·中大解聘教授別記

時代煎烤的悲劇·動盪中的四川政局·南京外交圈

獨立的·客觀的

·超黨派的·

觀察

徵求直接定戶

敬告讀者

本刊還祇出了幾期，銷數已經增加到九千餘份。目下一般刊物很少有直接定戶，本刊在出版後一個月中，直接定戶超過一千名以上，這種情形在我們自己實在也是出乎意外的；可見今日中國社會非常需要有這樣一個獨立的、超黨派的、自由思想的、並且在水準以上的刊物。

但是一個優良的刊物，必須得到更多更廣泛的讀者的愛護和支持，始能有更大的前途。任何一種社會事業，假如祇靠幾個人的苦撐努力，那麼一方面這種努力難望達到理想中的成就，一方面這也是不公道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希望有更多的讀者來做我們的直接定戶。就目下本刊的發行情形而言，每十個讀者中，祇有一個是直接定戶，其餘九個都是零購讀者。我們對于直接定戶，訂有優待折扣，並且每期都是提前寄出的，祇要一次付八千或一萬元，便可坐讀本刊五六個月，既迅速省事，又經濟合算；而本刊也受惠不淺。假如先生尚未定閱，希望即日加入為本刊的直接定戶，並在朋友間廣為介紹。我們希望本刊同人和讀者諸君，戮力合作，來增植這個新生的刊物，使它在更多讀者的愛護支持之下，能有更多的貢獻；因為這種貢獻是于國家有利的。

訂閱辦法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及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

觀察
第一卷 第八期
卅五年十月十九日
儲安平主編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店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濟南總經售：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青寧總經售：蘭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胡先驌：前中正大學校長
廖世承：國立師範學院院長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吳世昌

一 權威不是實力

中國人常說：「國於天地，必有以立」。以前只是一句抽象的理論，現在却眞的從天上到地下必須要找一個立足點，在這個科學猛進的地球上才能站得住。不過科學只是一種工具，誰有實力，誰便能用它。用的人或者把它增進一國的福利，或者自招滅亡，與科學無關，只在乎人。這一點本刊前幾期潘光旦伍啓元兩先生文中都已說得很詳細，無需贅述。依照「誰有實力誰便能用它」來說，有實力者似乎即有權威。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第一，工具不是權威，所以科學本身不是權威。第二，實力本身及其應用者不是權威。這又可分兩層來說。第一層是實力可以推翻既存的權威，但權威不必是實力。如某權威要靠實力來維持，——不論是原始時代的石斧石箭或今日的原子彈，這件事實的本身即證明這個權威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要乞靈於本身以外的工具。第二層是有實力者，具體點說，有政權者，未必能應用工具。中國過去的歷史都證明這兩點。清末也有甲午海軍，既不能應用，也就不足以借此挽救已經失去的權威。民初的軍閥，每一個都有或多或少的實力，但從沒有人會承認他們中任何一個是權威。

上文可以說是「權威不是什麼」，現在要說什麼是權威。本來所謂「國於天地，必有以立」，這個「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羣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顆思想上的大柱子，頂住了這個社會（或國家）的組織機構。一般人稱這個機構爲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這幾顆大柱子有的時候叫作三綱五常，有的時候叫作四維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產主義。不管叫它什麼，重要的是在這社會中的人羣必須能同意支持這些柱子，這些原則，否則整個機構垮下來必釀成極大的災害。尤其重要的是要同意支持，不是强迫支持。所以權威本身，定義地（by definition）是民主的，不是獨裁的或威脅的。權威本身是抽象的，它不能與人脫節。一離開了人，便是海市蜃樓，毫無作用，不成其爲權威了。

有實力者有時可以拖倒這些大柱子，但如果沒有再建的本領，便是有力者及其社會同歸滅亡。彌爾敦詩中的大力神 Samson Agonist 曾經挾倒過兩個柱子，現代的珊姆孫是希特勒，他想一隻手拖倒民主政治一隻手拖倒共產主義這兩大柱子，結果拖倒了他的祖國。

中國人其實很早就能分別實力與權威的不同。秦始皇雖然滅了六國，可是並沒有建立權威，當然他的實力也不能穩固持久。即使是不讀書的老粗項羽，他在打倒秦帝國的過程中，也知道要立一個民間懷念的楚懷王的孫子爲義帝，作爲支持他實力的權威。後來他自以爲有了權威，殺了義帝，劉邦才有所藉口，從此項羽便走下坡路。從此劉

家學了罷，天下未定卽尊鄒魯的儒生，孝武帝更大倡儒教，要拿孔子的大權威來壓倒諸子的小權威。從此以後，中國的權威一直是儒教。雖然其中曾滲雜了別的思想，但都託庇在儒教的大纛之下。直到曾國藩，他還用以打倒想利用基督教來建立新權威而未成的洪秀全。太平天國是武力成功而思想失敗，因此最後武力也不能不失敗。在他政治機構尚未建好以前，一開始就想打倒思想上的大柱子，結果連那面光芒萬丈的民族主義的大旗也無所附麗。近人常罵曾國藩是漢奸，殊不知他在一本正經的効忠於儒教這權威，而且成功了。至於滿淸，在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權威只有更沒落。

二 舊權威的被挑戰

向中國過去的權威——儒教——挑戰的，不是洪秀全，因爲他只是一筆抹殺，他只向滿淸挑戰，他到死也不知道其所以失敗的思想上的原因。也還不是船堅炮利，因爲那些在正統的儒教徒看來只是奇技淫巧，開通一點的也只認爲可以楚材晉用。直到郭嵩燾，嚴復諸人說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這才使有心人暗暗吃驚。

不過自從西洋人用砲艦送進了新舊約聖經和商品以後，直到五四運動，越過了辛亥革命，大多數中國人始終沒有智識或勇氣承認舊權威已經沒落，必須接受西洋科學文明的挑戰，吸收現代文明的原則，刻不容緩的來建立一個新的權威。直到抗戰前一二年，還有人閉着眼睛在喊「本位文化」！他們根本不知道現代的英、美、蘇、法諸國，沒有一國的文化和思想淵源是純粹本位的，他們甚至於不知道中國文化最光輝的時期——戰國，沒有一國的文化和思想淵源不受別國乃至夷狄的影響和融合。你們聽見過有「英本位文化」，「美本位文化」或「齊本位文化」，「趙本位文化」沒有？

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之失敗而引起的五四運動，雖然接受了西洋科學文明，打倒儒教的舊權威，但似乎並未有意識的建立起新的權威來。同時因爲要打倒舊權威，除了科學文明以外，又來了一個幫手，也可說是對儒教更可怕的一個挑戰者，那是共產主義，剛剛驅够了歐洲人，又來驅中國人了。打倒舊權威時人手多，固然可以快些成功，但如果要建立新權威，人手太多是反而不便的。因爲要建立新權威，必須有個思想的重心。思想不能遺世獨立，要有人主持，更要有人支持。五四運動時大家抬出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 科學)來當臺柱，但彼時的共產主義者卻說，德先生是英美的玩意兒，落伍了。應該抬出馬先生和列先生來。思想沒有重心，主持者和支持者都分散了，權威是無法建立的。而且，彼時大家只忙於從舊束縛中解放出來，忙於介紹新的東西進來，似乎沒有考慮到要重新建立權威。

三 發現權威的重要及重建者

在民國建立以前，西洋科學文明雖已排山倒海而來，但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大家並未想到其後果會改變整個的社會組織和思想系統，自然更不想到要摧毀舊的生活方式和原則，而另建一個新的權威。康梁主張改變政體，保留國體，張之洞之流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都足以說明他們只是遷就現實的改良主義者。從曾國藩所保存下來的舊權威，他們是要繼續支持的。康有爲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都準備藏諸名山，傳諸後代，不敢拿出來濟世的。事實上舊的權威在腐敗的清政和西洋的砲艦夾攻之下，早已成爲空心的老樹，而他們顯然尚未考慮到要建立一個新的權威。他們都是從舊權威中生長出來的人，舊權威之枯萎使他們覺得有點異樣，然也許並不覺得權威本身對於維繫一個社會之必要與重要，正如同現在有許多人也是如此。

發現權威之必要及重要，而想重新建立一個新權威的，在辛亥前後，大概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保皇，復辟都想恢復舊權威。)第一步，他先用民族主義的新權威來打倒滿淸政治上的舊權威。(在這方面，浙派的革命黨人幫了他很大的忙)。辛亥革命的成功，也許如東蓀先生所謂是緣新軍，是換朝代的老套，而不是由於有產階級的士大夫，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民族主義是主要的推動力。不過光是推翻實際政治上的舊權威是不够的，必得建立新的權威。——於是乎有了三民主義。因此可以說三民主義的基礎建立在民族主義上面，卽這一次的抗戰也是如此。

四　三民主義的性質

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以後的產物，所謂現代國家都是以它爲目標而建設起來的。它的構成要素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一部份。但它旣是現代的西洋產物，便也不能不注意其本身的必要條件：現代化。至於民權主義，則完全是新東西。在中國，主權是二千年來一直在君的。民是黔首，是元元，是君的財貨資本，故「子女」與「玉帛」齊觀，「宰臣」與「奴才」並名。古書上雖然也有「民爲貴」，「天聽視我民聽」一類的話，但這却和商人們所謂「金爲貴」，「市價要看貨色」，差不多，是爲主人的利益而立論的。古書上也有「民主」這名詞，傅孟眞先生曾舉晉書載記石勒等自稱「民主」，我却記得尙書多方即有「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的話，當然也不是現在的所謂民主；那是說「君爲民之主」，反過來也就是「民爲君之奴」。孫中山先生之用民權而不用民主二字，我想是爲避免歧解，使意義更爲清楚。在實質上民權主義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無可曲解，也無可推諉。民生主義在求人民的豐衣足食，也注意到住和行，用時髦的話說，是經濟民主。要做到經濟民主，財產分配，土地政策等必須有革命性的改變，天然的要傾向社會主義，所以他在民生主義最後一講中曾說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一類的話（我是二十多年前看的民智書局版，不知現在流行的三民主義有沒有刪改，因此也不知我是否已經落伍。）

孫中山先生要以三民主義來建立新的權威，因此三民主義的性質，第一必須部份保留中國舊有優良而適用於現代的傳統。第二必須勇敢的接收西洋現代文明的挑戰，接受並且應用其武器。第三必須預防共產主義的挑戰，用溫和的方法來避免可能的流血革命。他又鑒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摧毀儒教，摧毀一切舊有倫理傳統是其致命傷，所以特別注意保存四維八德，（雖然他也說西洋人的道德比現在的國人好。）使支持數千年來社會組織的柱子不致因突然抽去而崩潰，他接受西洋文明，要以新的柱子來逐漸替代和鞏固社會組織。他用溫和的民生主義來改良人民的生活，同時也替這個社會打了防疫針，免得慘受共產革命。他在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以後，容納共產黨加入，宣布三大政策，很明顯的是爲對抗當時各帝國主義者支持並指揮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阻礙他革命勢力的發展。

五　三民主義的成功和失敗

但終孫先生之一生，三民主義始終沒有被國人普遍認識。許多人以爲他是好高騖遠，徒託空論。只有一部分不滿於軍閥的腐敗統治，爲中國前途焦急，眼看舊權威失墜，茫茫然求索理想的青年，看到了三民主義，才如獲至寶，摩頂放踵去參加革命。三民主義成了國民革命的原動力，北伐才能迅速推進，可是手創者已不及見了。當時北伐軍的實力遠不如北洋軍閥，可是所向披靡，（這也證明實力不是權威）。使那些老粗的督軍聯帥之類莫明其妙，他們當然不知道國民革命軍找到了新權威。有人告訴他們：「黨軍有主義」。主義是什麼？原來如此，於是軍閥們也來「主義」，孫傳芳有「三愛主義」，張宗昌又有三什麼主義，他們以爲主義是槍桿上的裝飾！（可憐現在還有人如此想法。）

所以如果我們說，北伐的成功，是三民主義這個新權威打倒了沒有權威的軍閥，大致不會錯。當時不但有志氣的青年往廣東跑，連幾個重要大學的敎授都幾乎跑空了，留在五百多年故都的人，也都把中國的前途寄托在南方。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全國智識分子對於三民主義的注意。所以在孫先生生前未獲充分號召力的主義，在北伐時竟成了權威，在一個沒有權威的空間，新權威是容易建立起來的，只要有人來主持和支持。

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淸黨與剿共，這有許多原因，這裏不說。就題論事，可以說是國民黨怕共產分子篡黨，奪取她的權威。而共黨也確有這個企圖。在和共黨分家以後，國民黨不能不修改她的政策。這也不必詳說，只要把十三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的政策一比較，便可了然。修改的結果，對內是兵連禍結，啓日本的覬覦；對外是再傾向於英美集團，（租界只收回到九江爲止），一度與蘇聯絕交。這一段現代史，在抗戰期中生長的青年却已不甚了然。

抗戰是一個轉機：使國民黨重新檢討歷史，再度與中共合作，停止鬪牆而共禦外侮。這個轉機的重要收穫，使中共也不能不承認三民主義爲最

高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是抗戰的領導者。在初期，可以說抗戰又確立了國民黨的權威。那時全國人民熱烈團結的情形，眞使人回想到北伐初期的盛況。

但到後來，以國家的興亡來賭孤注一擲的抗戰，以抗戰的代價來重新建立起來的權威，又和人脫了節，又成了海市蜃樓。支持抗戰的共有兩種人：農村子弟拋兒別母上前線而不得一飽，智識分子經常捐出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兩者又都受官僚與商人的榨取，喂胖了這些沒出息的賤軀。官僚只問權勢，商人只要金鈔，國家要不要綱紀，社會要不要權威，他們是不感到興趣的。國民黨政治的腐敗，使她自身失去了權威，智識分子生活的低落和被淘汰，使他們失去了支持權威的能力。由這兩種原因，再加上財產分配的極端不合理——幾乎是好人一定窮困，混蛋一定發財——使社會道德無底的墮落。貪汚者自已固不以爲可恥，不貪汚的朋友，能沾他一點光，也不以爲羞，也許還向人誇耀：這份禮是誰送我的，暗示你還沒有這樣闊親友呢！兩性關係的混亂，也達到了損害民族健康的程度。許多秀優青年無法結婚，或已婚的無力贍養而分離。許多男女的性觀念也完全變質，五四時代青年男女熱烈討論「靈」「肉」一致，現在則變爲「錢」「肉」一致。錢和享受往往列爲最主要的條件，一切可以任錢換取，當一個社會完全失去了平衡與道德，也就證明了原有的權威不再存在。孫中山先生所要苦心建立的權威，北伐時代和抗戰初期志士仁人所流血換來的權威，給腐敗的統治打倒了。 我們現在不能不宣告：中國已沒有權威。

然而現在一般人都知道並且承認三民主義是立國的原則，這個思想的權威可說在理論上依然存在，只是高高的懸在空中；目前進行着的事實正和它背道而馳。三民主義曾經是北伐的主動力量，民族主義推動並支持了抗戰，但政治上再無辦法，將可能崩潰於共產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作用，似乎只有執行雅爾達密約，給外蒙「獨立」以自我解嘲。民生主義根本談不到，饑饉和兵禍只在加速民死。民權云云，也還在各黨派的荷包裏。然而朝野上下都在喊實行三民主義，看來正是知易行難，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知難行易——一個尖銳的諷刺！

六　中國目前需要權威

中國目前的情況，如果再繼續下去，內戰完成了經濟崩潰的傑作以後，隨之以來的是更偉大的傑作：道德和人心的崩潰。事實上目前這二者正在猛烈競賽。在內戰的旅進旅退之中，每出入一個城市，雙方各對人民作一次仇殺報復的比賽，遠比現在南京提倡的工作競賽來得努力，遠比敵僞時期的屠殺來得慘酷，都充分發揮了原始的野蠻性，（我有許多證據）。然而報上不見一字，即使披露也引不起誰的注意，因爲自朝至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已習於內戰，慣見同胞的被殺而無動於中，神經麻痺。誰來制止地球上這一部份兩脚動物的慘劇？三人？五人？馬帥？司徒？黨派利益，本國政策，會對這一部份兩脚動物的命運低頭嗎？中國若再沒有一個權威（不是實力而是權威）來制止這個比螞蟻蟋蟀還愚蠢的慘劇，難道眞甘心做第三次大戰的開場戲嗎？

在實際政治方面，打算盤和經商成爲最高指導原則。北平以前的警察慣稱其上司爲「我們掌櫃的」，現在則連救濟總署的署長也必須懂得做買賣，才不至於被逼辭職。任何一個簡任以上的官，如果既不貪汚，而又不懂得做買賣，絕對養不活兒女。

尤其可怕的是現在青年的苦悶、徬徨、莫知適從。他本能的知道思想要自由、進步，可是惡勢力警告他自由是「反動」，前進是「偏激」。他本能的知道撒謊是可恥的，可是打開報紙來一看，重要的國事，要人的演講，事後證明幾乎每件都是在撒謊。這還指有良知者而言。至於某些人所誇爲「馴良」的，則其思想已統制得四平八穩，非常衛生，絕無傳染病，也沒有危險性，他的看家本領是背十二條守則。剩下來的則頹廢與享樂，其心境和「十日談」中的人物差不多。這個精神上的創害，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治療，如果沒有眞正的權威來領導，這種現象可能延續到下一代。然而據說這一代就要負起建國的責任！

現在一般人另有一種恐懼，即經過八年對日抗戰以後，中國雖然勝利，而其地位不久又將被日本壓倒，領導東亞的依然是日本。去年日本剛投降，一位老輩學者用貌似玩世而其實悲憫的口吻對我說，「你看罷，美國

現在有兩個乾兒子。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將來呢，』他劃支火柴點起了煙斗，『日本這個小子一定百依百順，美國人非常喜歡。中國一定極不爭氣，扶不起的阿斗。美國人眞心想扶植中國，結果非逼他仍舊扶植日本不可！』那時勝利的歡潮尙未捲盡，現在則日本國內已事事都比中國上軌道。有的人已經在痛心地羨慕日本：軍國主義的權威剛被打倒，立刻又建立了一個權威： 思想，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主持者，美軍總部——麥克阿瑟。 支持者：全國人民。當然，這樣沒出息的羨慕立刻被國家的自尊心所打倒——附帶的也還有些勝利的虛驕心。我們不能說這個沒出息的念頭，其內在的動機毫無愛國心的分成。事實是事實，日本現在的工業、經濟，都在蒸蒸日上，日本上下的和衷努力，中國更不能相比，目前當然仍在亡國的狀態之下，解除了軍備，也無法內戰，可是二十年管制以後，我們的旅順、大連、兩條幹線，還捆在「友好」條約之下半身不遂，而日本則又是一個强國了。並且，即使把台灣、琉球、千島、庫頁、朝鮮加起來，有半個外蒙大嗎？我們今日再不努力重建權威，停戰建國，二十年的競賽會趕得上日本嗎？照目前的國內局勢，中國的希望究在何處？

上文已經說過，在理論上，中國思想上的權威非不存在，雖其是否充分，目前要不要修正補充是另一問題，但它懸在空中，沒有主持者和支持者，徒然是海市蜃樓，反而引起了究竟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這個矛盾。中國目前要建權威，比新起爐稿畢竟容易些，只要理論能够被實踐。問題的核心是誰來實踐？誰來領導實踐？按理說當然是國民黨，但是國民黨執政垂二十年，黨徒徧國內外，至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證明她有實踐的能力；不但沒有實踐的能力，而且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使三民主義有幾次可能成爲實際權威的機會都白白失去。我甚至懷疑今之高級國民黨員是否每人都把三民主義(那怕是英譯本也好)從頭至尾看過一遍，否則何至於其施政行事這樣的違反三民主義。國民黨已失去領導國人重建權威的資格不足以成爲權威的主持者，其黨員之濫、之偏、之馴良，也不足以成爲支持者。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中也有優良進步的份子，但至少此時尙不能起什麼作用。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領導抗戰的成績雖不佳，但確會克服不少困難，但也須同時指出現在政府中若干中堅份子並非眞正國民黨出身，而是半途加入以共赴國難的，只能說是其外圍黨員。另一部分是職業的專家，志在爲國服務，不必專爲某黨。這只要看一下外交、工業方面的陣容，便可了然。這些英美派的專家如果不在黨裏，也許主持或支持權威的號召力更有效，他們入了黨同時也分了謗，對社會，和對他們自己在一種意義上反而是損失。

共產黨當然也頗想領導重建權威，如果我們把這問題提出來。但在客觀條件上，似乎更不如國民黨。第一，在政黨地位她已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主義爲建國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第二，由於她過去排斥小資產階級的錯誤，使她黨內人才的學識水準受了可憐的限制。第三，解放區的政績如何外人雖不盡知，但就其最近蘇北佔區內行動而論，很難得有能力支持權威者的擁護。第四，一國的權威必須有獨立性，一味依賴任何一個外國是建立不起來的。此外別的黨派都有與國共兩黨類似之點，而其通病之一是太注意黨派利益而忽略人民利益，只要看年初政協會議之承認舊國大代表，犧牲十年來受教育青年之選舉權而換取各黨派的府委政委，便可證明此點。

建立權威有二個必要條件！有思想的基礎，有適當的人士。前者幸而已有三民主義作爲藍本。（我不敢武斷說全國學者之中一定不能創造比三民主義更進步的思想體系，但目前爲使事體簡單化計，應以三民主義爲藍本。）後者的條件其實也頗簡單：只要其才識品德足以主持，熱忱毅力足以實踐這個思想基礎，而且眞能代表人民，不受私己集團的限制。能符合這條件的，即令其隸籍黨派只要能放棄黨派立場而眞爲人民，也有資格。但在目前情形之下，毋甯是無黨無派人士更爲適當。我在本刊第四期「誰能替人民說話」一文中曾指出：政治腐敗，像大學教授這樣的匹夫應該有責糾正。重建中國的權威，當然比澄清政治更爲根本，更爲重要。只要權威能建立得起來，澄清政治倒是其餘事了。

代郵

各位撰稿先生：1.尙未接到本刊的先生們，住址固定後，卽乞 示知，以便按期寄奉。2.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卽請 函告所缺期數，當卽補奉。3.議請源源 賜致，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眞正的改善？

伍啓元

在人類的歷史中，公教人員所受到的待遇，像中國公教人員過去幾年那麼微薄，是不多見的。關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重要性，筆者已再三的談及。在這裏，我們就實際上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眞正的改善一問題，提出討論。

要對這個問題能有正確的解答，我們必先了解爲甚麼過去公教人員的待遇無法得到改善。我們認爲這是由於兩個基本原因和兩個技術原因。第一個基本原因是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知一般守法公教人員的困苦；第二個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員自身很少能夠眞正理解自身的利益。此外還有兩個技術的原因：一是財政的原因，負行政責任的人總是不大願意增加財政的支出，以免擴大財政的虧缺；一是物價的原因，在物價上漲當中，公教人員待遇如與物價賽跑，總是趕不上物價的。

關於第一個基本原因，是需要特別解釋的。平心而論，居高位的人大都是希望做好，大都是希望大家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的。但由於四個原因，居高位的人雖有不少是『來自民間』，也不知道民間的疾苦。（一）今日負行政責任的各首長，無形的收入很多。他們住的地方有時是機關所準備的住所，一切陳設佈置都由該機關的總務科或總務司去代辦；就是租用的房屋，據說租金也很低廉，到了抗戰末期在重慶一所二層新式大洋房租金也僅每月數百元。他們行的工具，有由公家借給汽油的汽車，不只他們自已可以用，他們的家人也一樣可以用。他們食的方面，柴米油鹽有總務司科代用最低廉價格購進，而一切應酬都由公家代爲支付。他們有時甚至衣料也有人送贈。這樣，則他們每月的開支不會很多的。他們的薪津收入大都能應付支出。他們自已的收入既足以應付支出，那就自然不會想到別人是沒有無形的收入，薪津所得無法過活了。（二）今日院部會主管長官次官，有不少是兼任國私營公司和銀行的董事等等，這一方面的收入常常較薪津爲多。就是沒有這些額外收入，也常有其他特殊收入的。有了這些補助，自然就不會想到一般公教人員的貧困了。（三）在今日的政治中，行政最高負責的人員常常不知道物價上漲到甚麼程度。有些居高位的人每人家中開支已數百萬元（或且數千萬元），而在帳面上他們的副官報告給他們的不過數千元（或僅數百元）。他們有時親自出門購買東西，希望能知『民間疾苦』，但商店的人因受到預先的警告，所索的價格遠在市價之下（有時不及市價十分之一）。這樣，他們自然不知道民間疾苦了。（四）今日在高位的人，每天時間大都花在接見賓客、出席會議、批閱公文、和其他種種繁忙的事務上，自然就與一般人的實際情形發生距離。勝利以前，社會上傳說某首長說他口袋裏放了幾百塊錢，很多天都用不出去，可見幾百塊錢還是很值錢的。不久以前，社會上傳說某首長估計一家四口每月有二萬至三萬元左右便够用。這些傳說是否正確不得而知，但確可爲行政長官不知民間疾苦的寫照。由於這四個原因，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理解一般守法公教人員的痛苦，自然不肯通過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提案了。

另一個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員本身的無力與愚昧。任何國家的公教人員處在這種情況都會有嚴重的反抗。中國公教人員一方面是過於微弱，一方面是受「貧窮哲學」和「自私哲學」（獨善其身）的影響，除了上海市大學教授曾罷教外，始終沒有集體的行動。公教人員即使有集體的行動，負行政責任的人也會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根本加以忽視（例如行政首長對上海大學教授罷教的態度就是如此），何況公教人員本身不爲自已的

利益而有所行動呢？政治上總是壓迫抵抗能力最低的人，公教人員的抵抗能力既如此微弱，自然就只有生活困難了。在公教人員中，不少的人爲着維持生活，走上貪汚舞弊的途上。居高位的人對於貪汚舞弊相當放任，這更助長了貪汚舞弊的風氣。貪汚舞弊的人增多以後，公教人員的陣線便不一致，這也是公教人員無法作集體反抗的原因。公教人員自身既沒有有力的反抗，他們的待遇自不易得到眞正的改善了。

此外在技術方面，因政府不肯强使有錢的人出錢，結果財政收入過小，政府便不能不拒絕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同時政府又常藉口調整待遇會刺激物價，因而對公教人員的待遇拒絕增加。

對於上述各原因的是非我們且不討論。但有一點我們必須强調的，即要使公教人員的待遇能够眞正得到調整與改善，則上列的原因必須消除或解決。

爲着應付第一個基本原因，我們主張立法院應制定兩種法案：一種法案是禁止各部會首長有任何的無形收入，他們的衣食住行都應按市價自行負担（如有優待則不得超過任何其他中小公教人員）；一種法案規定各部首長於就任時應將一切財產及薪津以外的所得（包括董事紅利等等）全部由國家封存，在任內不得支用。這樣才可以强使行政首長過一過一般公教人員的生活。如果監察院再盡力監督這兩個法規的實施，則我們相信公教人員的待遇立刻就會得到改善。

爲着應付第二個基本原因，我們主張組織『全國公教人員總工會』（因目前公教人員所得不如一般工人，只能組織工會），於必要時用集團罷工怠工等辦法去要求改善待遇。只要這個『總工會』能够組織成立，則政府必不敢忽視公教人員的合理要求的。

爲着應付財政，我們主張立法院另制定兩種方案：一種限行政院於一個月內實行富戶捐並舉辦財產總登記；一種限制政府發鈔最高額，以後未得立法院同意不得增加發鈔額。前一種法案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使改善待遇能有財源；後一種法案使立法院得一武器以保障公教人員待遇——每次行政院要求提高發鈔最高額，如公教人員待遇不同時作比例的調整，立法院即不予通過。

爲着應付物價，我們主張政府或『全國公教人員總工會』應成立一專家委員會，加以研究，作成報告，使調整待遇的不良影響能够減少。

我們相信只要上述各點能够辦到，則公教人員的待遇即可得到眞正的改善。

戰從義·政從仁

——哀中國的兵學——

純青

如果中國還想做中國，就要有中國的思想，中國的規矩。我們應接受數千年民族的傳統經驗。如果中國還想做一個國，旁的不說，「兵者，國之大事。」應先學習我們祖宗的兵學。我認爲現在已失掉了我們的兵學。愛國腸熱，不能默爾，因草茲篇問世。

假使中國思想有三個系統，所謂儒，道，墨。他們就都是反戰的。儒不學兵，道不主爭，墨非攻戰。因此中國叫做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實在愛好和平，而當之無愧。先說儒：孔子答衛靈公問：「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最不喜歡子路，罵之爲：「由也好勇，無所取材。」這種思想一直傳下來，顏氏家訓有一篇誡兵篇，教他的子孫不要學兵，他說：「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即顏氏這一族，不屑以「用兵取達。」只有兩個人，「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算是他們「得姓以來」之「無淸操者」。但是「皆罹禍敗」了。是爲誡。宋朝受

外族欺侮，詩人陸游譏池春詞有句：「笑儒冠，自來多誤。」卽感慨儒冠誤了他沒有學兵。儒家不重武事如此。次說道：老子道德經：「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他認爲戰爭是無道的產物，而主張：「以道助人國者，不以兵强天下。」戰爭是殘酷的，破壞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老子看得很淸楚。設不得已而用兵，用兵而勝利，也不可以讚美和歡喜。他說：「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說：「勝而不美，美之者是樂殺人也。」他這樣斷言：「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道家的德行如此。再說墨：墨子是著名的反戰論者，他以爲戰爭是「大爲不義」，其非攻篇云：「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人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但戰爭殺死了千人萬人，而不以爲不義。他痛心以「少黑爲黑，多黑爲白」，至黑白完全不辨。墨家的非攻如此。這三個影響中國最大的思想，都是反戰的，都有他們的好生之德。

但這不是說絕對不可從事戰爭。若湯放桀武王伐紂這類革命的誅伐是可以的。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桀紂就是這樣的「一夫」，這樣的「一夫」可殺。墨子也說湯伐桀武王伐紂，「非所謂攻，謂誅也。」怎樣纔可以誅，是有標準的。譬如沈同問孟子：「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後來齊人果然伐了燕。有人跑去責問孟子。孟子聲明他只說燕可伐，沒說「孰可以伐之」。「以燕伐燕」他不以爲然。就是說，他不贊成以無道伐無道。不可以無道伐無道，若以無道伐有道，或以更無道去伐無道，當然更不可以了。這是可否戰爭的標準。

單就兵學來說，中國有七子兵略，那是權威而專門的書。我們可以聽聽他們的意見。

中國兵學的核心是「仁」。孫子的「道」，吳子的「文德」，李衞公的「正」，尉繚子的「道勝」，三略的「柔德」，六韜的「愛民」，司馬法的「仁本」，都說戰爭是不得已的，只有一個場合可用，卽「殺人安人」，「以戰止戰」。司馬法有：「國雖大，好戰必亡」的警告。六韜釋愛民之意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孫子判斷勝敗第一句便問：「主孰有道？」中國兵家思想，是與儒道墨的精神一致的。他們並沒有把殺人當做職業。深深了解理想的軍隊，應該是仁義之師，「仁者無敵」，我以爲這是對的，自古迄今，未有窮兵黷武好戰樂殺，而可成功者。

中國兵學以爲最好的勝利，是全爭。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這是由「仁」演繹出來的。司馬法分析古代戰爭，說夏用「德」，殷用「義」，周才用「力」。用力殺人是最下等的。唐太宗問李靖：「兵法孰爲最深？」靖答：「臣嘗分爲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道是什麼，是「神武而不殺」。故講殺人的兵學本身，已要不得。「三略爲衰世作」。這句話何等傷心。以視今日內戰，又該何等痛心。我們這個衰衰世，根本不懂六韜所說的一句話：「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對外抗戰，爲民族生存，應加鼓勵。就是借用別國力量，也是可以的。太宗對李靖笑着說：「番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李衞公兵略）。但在理論上，我找不出以蠻夷攻本國兄弟的任何根據。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這兩句話。如解釋爲中國不要殖民地化，是很適當的。這是政治方面。在軍事的利害上，六韜守土篇說：「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如國柄的借，指借出；利器的借，指借入；姜太公的話一針見血，高明極了。我們實在不能更贊一詞。

常人以爲眞理是兵要强。但高明的戰略家不那樣想。三略：「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這是更高一層的眞理。幸而這個眞理沒有給希特勒和日本軍閥學去，否則我們完了。假使有人再誇耀他的兵强，不知柔之爲德，當不配做中國人，兵法哀之。

好吧，戰吧。戰有戰法：第一要得人民的同意與支持。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人民不同意的戰爭如何打得？吳子曰：「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民知上不愛其命，不惜其生，這仗如何打得？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救，以義戰。」這戰是否有仁有義？尉繚子曰：「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人事是否盡了？又曰：「凡兵不攻無

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此皆盜也。」今何城有過？何人有罪？三略曰：「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民衆的疑惑何詞以說？說下一點，戰爭是起因於爭利的，看今日之利如何。尉繚子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丈夫，亡國富庫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可救。」我們這個國是什麼國？誰富？三略：「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今日社會，是不亂呢？還是思散呢？

好吧，戰吧。戰有戰法：不要長日暴師。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這是說用兵之害。從事於無底止的戰爭，不但拖死人民，也會拖死了自己。尉繚子有這樣一個用兵期限的標準：「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今日之患果在若干里之內？若干里之內又已打了多少時候呢？中國人被譏諷爲沒有時間觀念的民族，打仗也不算時間。其實一般人都知道那時間是無限長的，一打就是十年八年，這段時間接上第三次世界大戰還可以過剩一大截。此之謂「無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爭是逆德。說是爭土地？姜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擅天下之利爲目的的戰爭，是以失天下的方法去取天下。無論如何，一國之內的「天下」，乃「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六韜)。我完全贊成孔子的話：「有德此有土」。無德不能居土。由民主的觀點說，土地是人民的，只有人民可以爭，可以守。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只有人民爲他們的土地可以爭，可以守。

說是爲權？權是怎樣產生的，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爲王也。天之立王，以爲民也。」王代表權。但王有王道，董氏謂：「王道通三。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而不通道，則王非王，王非王則權非權。三略：「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叛無德之主，是道德的。用現代的名詞說，「主權在民」。民可以賦與及剝奪政權治權。權不能定，該問問人民，豈可以力爭？

說來說去只有荀子那一句話：「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毀滅人民的戰爭，天命殛之。勝利逾年，中國已喪失了國際地位，喪失了勝利，喪失了人心，喪失了民族道德，我不忍看見再喪失了中國的兵學，喪失中國兵學我們國將不國。箋呼救如上。讓我再抄一段兵學做我的結論：

六韜順啓篇：「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附：寫完了上文，讀報聞勝。我想起了兩個故事：(一)呂氏春秋愼大篇：「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吾是以泣。』」太史公嘗韓非子爲「極慘礉少恩」，不知在好生及反戰的立場上，他倒是父母生的兒子。中夜擲筆，極目蒼茫，不勝感慨繫之。

九月二十六日

更正

一、第四期戴文賽先生「原子能研究之發展經過」一文，第十三頁上半頁第十四行「那麼全世界人民在三百年內」，應改爲「那麼全世界人民在三十天內」。

二、第五期吳世昌先生「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一文，第五頁下半頁第四行「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句，文中掉了一行，原文應爲「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軍』國。十七年南京建都到現在，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又下文「一軍一黨平分了三十年的天下」；應爲「一軍一黨平分了三十五年的天下」。

三、第六期宗白華先生「文藝的空靈和充實」一文，第廿二頁第一欄第十行「李商隱」應改「李周隱」。同頁第三欄第廿五行及第廿七行之「叶」字應作「叫」。

思想之改造（中）

胡先驌

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第一、必使之尋求精神與物質之進步，認進步為可能而且必需。此種進步主義，必須副之以卓越之眼光，豐富之學識，而非盲目的但求物質之進步。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一日千里，工藝之發明，日新月異。吾人控制與利用自然能力，已非昔日所能夢見。故在將來教育昌明之後，人人心中必有尋求進步之思想。然必須知人類之求進步，非僅求物質進步而已。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以增加吾人物質之享受，使生活有保障，固屬切要；然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在物理化學高度發達之狀況下，已為掌握中事。今日之經濟，一俟世界經濟復員完成，即為有餘而非不足之經濟。苟人類不過於愚蠢，則大可以安居樂業，盡情享受。但吾人同時必須了知盲目之求物質進步，有時且可以予人類以不可救藥之災害。故同時必須尋求精神上之進步。二十世紀之生物科學尚屬幼稚，心理科學則僅在萌芽時期。吾人對於吾人之身心，了解甚少，故必須求人類生理學心理學日有卓越之進步；人類生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身體；人類心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政治經濟教育社會與吾人一切生活方法。於是方能確實掌握吾人自身之命運；使吾人身體增强，壽命增長，健康進步，精神活動，日新月異，臻於盡善盡美之域。吾人必須對於人類未來之進步有堅定之信念，尋求之決心，明切之認識，正確之方法，則中華民族方能逐漸改造而為最前進之人羣。

第二、改造思想必須了解自由與自治之重要。自大體言之，中華民族最崇尚自由。自周代封建制度推翻及暴秦覆滅之後，人民之生活已極端自由。政府對於人民之生活，除徵稅徵兵役外，毫不干涉。西漢文景時代之黃老政治，即所以養成此種絕對自由之風氣。而自封建廢除，平民皆可以選舉或考試參加政治，政治自由，尤非古代多數國家所能企及。故中國之政治形式，頗類似英國之虛君民主政治。惟政治操之於士大夫階級，而非人民皆能直接與聞政治，故韋爾斯稱之為變形之民主政治。人民之生活既不受政府之干涉，故自治甚為發達。在古代鄉治制度未破壞以前，地方自治之內容，至為完善。魏晉六朝大亂之後，鄉治制度雖已破壞，然人民尚能賴宗法社會之組織以執行地方自治。在極少數地區，甚至人民可完全脫離政府統治而維持一美好之自治制度至數百年之久，不得不令人驚嘆。此種自由自治之精神固屬可佩，然在今日之社會中，則有甚多之缺點。第一、人民雖有消極拒絕政府干涉其生活，而不知積極參加政治。又在鄉里中，惟智識階級得與聞少量政治，而不識字無智識之農工階級則無與聞政治之可能，亦無與聞政治之願望。且因政治之腐敗使人民認政治罪惡為人生必然之現象，如病老死者然，而不求作自動之反抗與改革，惟希冀有一賢長官涖臨以施行善政；人民此種消極態度，乃所以使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得以魚肉人民橫行鄉里之主因。第二、自治僅能施行於宗族小範圍之內，施之於一鄉一邑則百弊橫生，至大都市則尤甚。蓋人民對於大規模之自治，既無經驗，亦無興趣，故憲政不易施行，自治難於建立。第三、統治階級喜於濫用職權以遂其私，不知尊重人民自由，亦不喜人民之自治。而自歐洲集權主義發生之後，談政治者亦思效尤而剝奪人民之自由。今日之政府官吏雖名為篤信民權主義，且奉命推行新縣制，而摧殘漠視人民之自由，反較昔日之官吏為甚。共產黨徒雖以民權為號召，而愚弄人民，魚肉人民，反較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為甚。此乃由於篤信德意蘇之集權主義之故。故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加倍灌輸自由與自治思想於一般民衆，根絕一切集權主義之思想與行為，方能養成眞正之民主政治。

第三、改造思想必須眞確了解平等之意義，養成平等之信仰。在中國自封建制度推翻之後，階級制度消滅已久，各朝代之貴族每每因其子弟之不肖而式微，或因朝代變更而夷為平民。魏晉六朝時代雖極尚門閥，然此種貴族至唐宋以科舉取士，白屋公卿已成為一般民衆之最高理想。故平等思想以二千年之陶冶，已成為民族之第二天性。惟中國之平等尚不澈底。

因政權向來操之士大夫之手，故二千年來國人皆重視士大夫階級，固然任何人（倡優隸卒除外）能讀書作文應試便得爲士大夫，然士大夫終賤視農工階級，而農工階級亦有自卑之心理。此種心理至今日仍未消除。由於重視士大夫，故重視官吏；重視官吏，故人競爲官。爲官之後，便可享受社會中種種無形之特權，即不爲官而紳，亦可以魚肉鄉里。此所以官僚政治乃成爲牢不可破之政治形式。共產黨徒雖以無產階級革命相號召，然其行爲仍與官僚無殊，甚或變本加厲。

故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澈底養成歐美式之平等思想，尤須嚴防蘇聯式與法西斯主義式之政治思想。一方面須養成智識階級中之眞正平等思想，一方面尤須養成一般民衆中之眞正平等思想，勿稍存對於智識階級與統治者之自卑心理，庶可自變相之民主進而爲眞正之民主。再則必須養成眞正男女平等之思想。此事大非容易。中華民族中男女間社會地位之差別不及日本印度與回教民族之甚，而過於歐美民族與國內苗傜倮藏諸宗族。家庭之內，母與妻固能執掌家政大權，然社會則顯然歧視男女之地位。性道德之二重標準尤爲可議，而絕不易矯正。尤以在廣大之鄉村中，宗法社會尚難改革，女子繼承權雖經法定無由執行。故女子極難獲得平等之地位。而女子教育與社會環境不良，亦以使女子在學識與服務能力上，不能與男子並駕齊驅，故亦不能養成男女眞正平等之思想。然此種思想不能養成，則一半之人口不能獲得公平之待遇，與靈性之發展，其爲害之大可以想見。此所以欲造中華民族，必須使人人皆了知與篤信男女之智能與其在種族上所負之責任雖有不同，然其地位本爲平等；甚或須認女子在種族上之地位較男子反爲優越，故在人格上須視爲平等。惟以心理生理有基本之差異，故須求分工合作，而不必一切從同。復次，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一切種族平等之思想。天下一家，用夏變夷，固爲中華民族最高之理想。中華民族屢爲外族所征服，亦即所以祛除其種族優越感。然以國內尚多文化低下之各宗族，無知之國人對之尚不免欺凌輕視之惡習。而在南洋與中南半島方面，亦因國人之經營事業之能力遠勝於土人，故不免欺凌輕視土人而招致其反感。故若不及時養成眞正之種族平等觀念，則對內可以使各宗族離心，對外可以引起種族間之惡感。吾人必須警覺一事，即暴君悍將在我國歷史不絕書，而歷代國內弱小民族之暴動，十九爲漢人所激成。苟非養成眞正民族平等之思想，一旦國力强盛，在中國未嘗不可發生帝國主義。必也使人人皆了解與篤信世間所有人類各種皆同一源，僅因環境之影響而有體格與文化之殊異。文化落後之民族除極少數外，智力並與吾人無殊，自應一體視爲平等。且人類開化不及萬年，來日方長，一切人類獲得平等自由，並非艱難可望而不可及之事，蘇俄之開化與教育其國內文化落後之民族，乃至堪效法之事。

復次言平等不僅在法律與政治上一切人不論階級不論性別皆須平等，在經濟上亦須平等。所謂經濟平等，非謂人人須享受絕對劃一之經濟待遇；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終爲最高之經濟理想。即此等理想不能一蹴而幾，然節制資本，使財富不能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大衆不致變爲經濟奴隸與所謂無產階級，終須爲人人所篤信之信條。必如此中華民族方能逐漸向理想的大同郅治邁進。

博愛與自由平等同爲法國大革命三大口號之一，然以人類之習於自私，其不易了解與篤信博愛，較不能了解與篤信自由平等爲尤甚。孔子云：「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乃孔子深切了知不易博愛之現實語。然禮運之首章「大道之行也」云云，即表示孔子博愛之最高理想。不過儒家之言博愛，總有以親疏爲先後之主張，故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也。墨子之言兼愛則爲更進一步而無差等之博愛，其精神與佛陀耶穌相同，雖非常人所易幾，然視儒家主張有先後之博愛，理想上似較高一籌。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以墨子耶佛無先後無分別之博愛爲理想，而或只能做到孔子有先後有分別之博愛。若以後者爲理想，則或並此而不能矣。中華民族以過重宗族之關係，又兼困於饑荒心理、故缺少博愛之美德；而以缺乏同情心爲西人所詬病。此種缺點乃必須盡力矯正之者。第一必須使盡人皆知人類同出一源，以最高之哲學眼光觀之，凡戴髮含齒之倫，皆我父母兄弟。即至後世人類已逐漸分化，然以中華民族之屢與其他種族混雜，則我華族之與黃髮碧眼之阿利安族，鈎鼻厚唇之塞姆族，鬈髮黑膚之崑崙人，或小黑人等等，何在而無血統關係。吾人平常之認宗族僅認父黨，然按遺傳原則，則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上，溯至無窮世代，皆爲我之祖先。故吾人三十世以上之祖先，其數即達億萬。果爾，則尋常一路人，若細究之皆可與吾人有血統之關係。故吾人苟須愛吾宗族吾鄉黨，則在論理

學原理上亦須愛吾每一國人，每一人類，甚而愛及熱帶叢林內吾人之古遠宗族猩猩，與池塘內吾人之更遠之宗族靑蛙。張橫渠「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之語，最能發揮儒家博愛之精神。是宜廣爲家喻戶曉使人人皆能了知與篤信此最高尚之思想。

既了知與篤信博愛之眞理，則同時必須了知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中華民族與其他文明民族較，乃最不能互助合作者，然亦數千年來艱困之生活有以養成之。在封建時代土地公有，人民受公田，其耕作皆取集體方式，且鄉治周密，守望相助，爲鄉村社會之基本精神，故互助合作之精神至爲普及。及至秦人廢阡陌，闢草萊，廢封建，獎勵農耕，以土地爲基礎之原始社會之互助合作制度遂完全崩潰，而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乃爲二千年來國人生活之基本原則。土地既爲私有，則人人皆欲爲獨佔之地主。農夫手胼足胝，積銖累寸，博得少許血汗錢，即欲購買三五畝地而爲自由自在之小地主。工人終歲辛勤，稍有積蓄，亦必開一小舖，招一二藝徒或幫夥，爲老闆。商人亦然。人人皆欲獨立經營而不欲互助與合作。可謂中國人盡人皆欲爲小資本家而不能爲合作農場或合作社之一份子，此皆個人主義之爲祟，而間接爲饑荒心理之結果。殊不知盡人皆爲社會一份子，個人之得有今日之一切享受，皆過去與現在全體人類互助合作之結果。吾人無一日不在利用人類之互助合作以增進吾人之生活。故人人必須了解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且須養成互助合作之習慣。又私人之生活固須互助合作，國家社會之事業亦須互助合作，而在國際與民族間尤須互助合作。庶不至猜忌橫生，競求侵奪，嚴立關稅壁壘，各求自足自給，因而引起經濟之不景氣，而植戰爭之禍根。否則決無建立富强康樂大同郅治之希望。

守法與守秩序實爲改造中華民族最重要之思想。中國人講情面而不守法律最爲世人所詬病。在文化落後之簡單社會，不守法或尙可敷衍苟安；在複雜之現代，則不守法即不能建立良好進步之社會。蓋法者乃人人所必須遵守以節制其行動之規條，不容個人輕易違背者。在春秋時代之宗法社會，社會組織甚爲簡單，故雖情重於法，尙不至招致大亂。然即彼時之大政治家亦以法治而收卓效。如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是也。至戰國時，則社會之進步一日千里，其時各國之政治經濟狀況之進步，皆非百餘年前之春秋時代可比。故非法治決不足以範型齊一此龐大複雜之社會。故雖儒家如孟子仍秉承孔子「道之以禮，齊之以德」之故訓，而有「有治人無治法」與「徒法不足以自行」之名言。然較富有現實眼光之荀子，則已偏向法治，而其門徒韓非李斯皆變爲法家。法家申不害愼到之出於道家，爲吾人所周知。墨翟之尙同，亦即法家齊一之意。儒墨道三家均合流而成爲法家，可見時代之需要有如此者。後世之大政治家如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莫不兼用儒法以治國，即確認法之重要。惜自漢武表章六經之後，儒家學說深入人心，而宗法社會數千年保原存狀至今而不變，故法治之精神始終不能建立。此大足爲中華民族將來發展之障礙。尙情不尙法，則客觀的大公無私的社會準則不能範型人，而社會不免陷入無政府狀態。夫守法並不須學法家之苛酷，而創制法律儘可使之曲盡人情，執法時亦可寬大仁恕不求苛刻。然立法爲一事，守法又爲一事。無論任何種法律與規則，大而至於爲國家基本大法之憲法，小而至於運動比賽之規則，莫不須忠實遵守。法律不良或窒礙難行，儘可改作，然個人與團體皆不得故違之。英國政治之清明，即繫於其人民守法之精神，而吾人則不然，一般人皆以能不守法爲榮。自古以來言法即有議親議貴之說。此說數千年來深入人心，故人人皆不欲守法。議親則人人皆有庇護其親族違法之道德義務，議貴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遂養成統治階級「禮法非爲我輩而設」之謬妄心理。如此政治焉得清明乎？且因有此不守法之精神，遂使團體生活難於維持。中國股份企業公司每每失敗，而個人之事業則每有偉大之成功者，即不守法之惡德所致。此與中國將來產業建設大有妨害。大企業之能否成立，即以此惡德能否矯正爲依歸。至於國際和平尤賴守法觀念之能否養成。戰爭起於國際之無政府狀態，而此無政府狀態則由於在主權國家之國際間無强制之法可以遵循。過去雖有所謂國際公私法，然苟任何主權國家故意違背之，他國亦無可如何。過去之國際聯盟，今之聯合國，皆未能樹立國際間之法治，蓋由於人尙不能了解與篤信國際間法治之重要。故中華民族如不能了知與篤信國際間之法治，則他日國家富强國力充溢之後，若遇一有大力之野心家當國，未嘗不可爲戎首而引起國際之侵略。

守秩序與守法同屬於一種服從公共規則之行爲。中華民族習於無羈勒之個人主義，又缺乏近代社會中有秩序之生活訓練，故無守秩序之習慣與思想。魚貫守候乃所不耐，遂至行路購物發言，一切一切皆無秩序，亦不認爲有秩序之必要。將來多受此種守秩序之訓練，自可逐漸矯正不守秩序之思想。然亦必須了解與篤信守秩序之思想，方能有守秩序之行爲也。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初生的嬰孩，在家庭中開始有「相互的行為」的經驗。家庭誠然為社會的基層組織。嬰孩雖生來有強盛的衝動，滿足個體需要的要求，但沒有人注意牠的飢餐渴飲，保抱扶持，牠就無法生存。在牠生長的歷程中，引起了兩種作用，依賴與訓育。母親在滿足嬰孩個體的要求時，發揮了慈愛、同情、和合作，同時造成了拍牠、撫牠、嗅牠、抱牠、搖牠、唱催眠曲的習慣。嬰孩在母親的懷抱中，深深地感到安全與依賴，逐漸地引起了嬰孩本身的愛與同情。這是相互行為的起點。

在這個時候，嬰孩已受到訓育的影響了。飲食須有節制，睡眠須有定時，四肢活動也須受相當的拘束。牠不能要怎樣就怎樣，牠必須接受成人的經驗，也許牠會感到環境的壓迫。逐漸間幼孩接觸的範圍更廣了。牠的父親，哥哥姊姊，或其他有關係的人，都要干涉牠的行動，妨礙牠的自由。倘使牠不服從他們指示與勸導，有時就受到痛苦的責罰。牠感到四圍的壓迫，越來越厲害，因之引起了憤怒和敵抗的反應（antagonistic or aggressive response）。假使在這時得不到物質的補償，情感的安慰，兒童就可能變為性情暴戾，或意態消沈，或內心煩躁。

任何兒童，天生的衝動，都要受到環境的抑制，因之任何兒童都有敵抗的反應。教育得法，可引導這種反應入于正軌，長成後自能在遊戲、藝術、商業的競爭，和事業的建設方面發洩。教育不得法，就養成强凌弱，衆暴寡的態度，浸假而演成民族的仇恨，人類的殘殺。所以人類的罪惡，尋根究底起來，和兒童時期所受的教育，有密切關係。

現在且說個己怎樣產生在相互的行為或社會的行為中。個己初步的產生，在兒童對母親或他人有一種預期的反應（anticipatory reactions）。例如兒童希望母親滿足牠的食慾時，牠有一套反應方式，使得母親了解牠；母親在滿足牠的需要時，牠自能迎合母親的反應。這時，牠的行動與母親的行動，如節奏般的自然合拍，牠與母親無形間已合而為一（identification）。所以兒童要滿足牠的要求，必須能預期他人的反應，變更他個己的行動。

預期他人的反應，有了語言的幫助，就益覺便利。語言的基礎在發出各種不同的音聲，每一個音經過反覆的練習。語言的開始，在看了實物說出名稱，使實物與聲音發生連繫。再進一步，兒童不必看了實物，就能說出名稱。這時候，牠已懂得符號的運用了。符號不僅代表事物的名稱，並能代表事物的性質、數量、關係、和種類。符號不僅指示當前的事物，並可表達未來的希望。有了語言做媒介，兒童與母親或他人的相互行為，益發表現得真切了。

不特如此，有了語言媒介，兒童可以扮演任何人的動作（role-taking）。一忽兒造屋，一忽兒燒菜，一忽兒體操，一忽兒打仗，一忽兒招待客人，一忽兒舉行婚禮。在這些遊戲中，牠完全在扮演各種角色，模仿他人的語言行動。要是父母有什麼小差遣，例如看屋、放牛、買菜、伴弟妹遊戲，牠效法父母的聲音笑貌，更維妙維肖。這時，牠不單能模仿他人的言語行動，並且能立于旁觀的地位說話，例如二三歲的兒童能用他人的口氣表達自己的願望，說：「寶寶要吃糖」，或「妹妹不要這個」。到這時期，個己的發達又進了一步。

因為兒童能模仿他人的行為，又能替代別人對自己說話，所以在牠的經驗中，產生了一個社會的個己（social self）。牠能觀察自己的行為，如同觀察別人的行為。關于這一點，我們可引用米特（George H. Mead）的話。米特以為解釋個己，不應專從兒童的學習、仿效、及綜合他人的經驗着想。這不能看到性格的全貌，只看到靜止的部份。性格方面，還有機動的部份，就是「我」（"I"）。「我」與「己」（"me"）有別。這個

學說，並非米特所獨創，以前的心理學家如勞合斯（J. Royce）包爾溫（J. M. Baldwin）詹姆斯（Wm. James）和柯萊（C. H. Cooley）等都隱約提過，不過米特說得格外清楚。「我」與「已」在文法上混淆不清，所以解釋時較爲困難。照米特的意思，「已」是從父母、兄姊、友伴、師長、他人、及想像中的人物所得來的聲音笑貌，綜合各種經驗而成的部份。當兒童扮演任何角色時，並非呆板的模仿他人的言行，另有一個牽線的因子，這須是「我」。「我」是代表天賦的衝動，引導個人向目標前進。

在習慣的反應中「我」與「已」的分別，不甚顯明。但遇到一種特殊的情景，「已」的反應大體能符合社會的準則，「我」的作爲就不易捉摸。不單是別人不能預測牠，就是自己在事前也把握不定。所以在思想的歷程和外表的動作中，「我」是一種不易捉摸的、特殊的、新奇的成分。有了「我」纔有個性（individuality）。「已」是代表羣性，所謂道德的個已，所謂良知，佛洛依德（Freud）的所謂「超已」（"superego"），都從「已」中產生。「我」與「已」聯合行動，就形成了個已的性格。倘使性格沒有兩重成分，就有新奇的經驗和自覺的責任。

「我」的行爲，雖不易預測，但社會與教育的影響，也能使「我」發生很多的變更。成人的「我」，已與兒童的「我」不同，因爲「我」已受了「已」的熏陶，否則社會將沒有共同的規則，共同的禮節可遵守，各個人的行爲可大相懸殊了。不過「我」的作用，依然存在。常聽人說：「我本想這樣做，但後來一轉念間又變更了」。這一轉念間，就是「我」在作祟。社會上有許多人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就因爲「我」與「已」不相協調，既不能抑制衝動的「我」，又不願違反社會的範疇，顧此失彼，進退彷徨，遂走入虛偽欺世的一途。

彌補這個缺憾，解脫這個矛盾，惟有充分培養合作精神，互助習慣。例如兒童在家庭中，初僅與各個人發生關係，逐漸間家庭中各個人綜合成一整個的對象，兒童自身亦爲此對象之一份子，米特稱此對象爲，"generalized other"。到此地步，兒童對家庭已有新的認識，本身能負起家庭一部分的責任。再進一步，在團體遊戲中，此精神表現得格外精采，因爲團體遊戲需要合作行動（teamwork）。在熱烈的團體遊戲中，個人已忘却自身的存在，甚至已忘却各遊件的本來面目，祗知道遊戲在進行，各個份子遵守遊戲的規則，互助合作，以達成遊戲的目的。這時，要有一個人表炫他自已的技能，妨害團體的利益，必受人的斥責，自已亦感到羞愧無地。擴而充之，任何團體，任何集會，任何軍隊，都可在各個人心目中造成一整個的對象（the generalized "me" or "other"），大家感到利害與共，休戚相關。在這樣的情景中，「我」並非不可捉摸的，「我」愈捉摸，性格愈可靠。所謂品性，就指點個人的行爲不致有負社會的期待。所謂自信、自立、自尊，就指點個人對于自已的一切行動，有相當的把握。

因此，道德的訓練，對個已的產生，佔很重要的地位。天才出衆的人，往往喜歡獨抒已見，不肯隨俗浮沉。這種人有時被羣衆視爲離經叛道，但在進化的社會中，時有創獲。不過這種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總須合乎中庸之道。法律、規則、風俗、習慣，都在使各個人有共同的趨向，合理的行爲。能滿足這個條件的，得到鼓勵；不能滿足的，受到譴罰。所以道德教育的初步，慣用口頭的諄諄告誡，使兒童的行爲在未發生時，先有一種準備，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適當，什麼是不適當。牠又須知道怎樣做一個「好孩子」，一個「好學生」，一個「好公民」，一個「忠勇的戰士」，一個「勤勞的生產者」。在消極方面，使牠鄙夷地痞、流氓、土豪、劣紳，野心的侵略家，殘殺人類的劊子手。告誡的時候、必須富有情感，纔能引起深刻的觀念和情緒。

但口頭的告誡，必不能與實際的行爲相符合。要造成道德的個已，還須在實際的行動中養成，否則人格就有破裂的危險。上邊說過，人自呱呱墮地後，原來的衝動、願望，時刻受到阻礙，時刻受到抑制，因此引起了憤怒和敵抗的反應。這些情緒，要是沒有補償的方法，便會發生苦悶、悲觀、幻想，強者走上恣睢暴戾的一途，弱者便套上一副假面具，來應付各方面。人格的破裂，似乎爲不可避免的事。但實際並不如此。內心與外表的衝突，可用替代或補償的方法來調和。小「我」逐漸擴大，團體的目的、符號、價值、和活動，變爲個已的目的、符號、價值、和活動。人我的競爭，變爲團體的競爭。由此團體以及彼團體，由小團體以及大團體，由直接的團體以及間接的團體，個已的論格，自能逐漸統一。我國儒者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是這個道理。由近而遠，由小而大，以至于養成「民胞物與」的胸襟。物尚且能愛，何況人類。同情、慈愛、互助、合作，爲統一性格的要素，亦爲建成民主的礎石。

觀察通信版

一個政府簡任官吏的回鄉見聞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

豐收醫治不了農村的殘破和創傷
征丁不知葬送了多少青年和家庭
鄉長保長甲長祇知要錢要糧要命
剝削又剝削·農民盡變成了赤貧

政府買怨·人民受害·一字一淚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皖中通信）八月的鄉村，在江淮地區，正是收穫季節。今年又是豐收，一望無垠的黃稻，倒臥在田中，等候着刈割，一筐一擔地被運到新打平的「場基」上。這時瘦着一年辛苦生活的農民，在枯黃的面龐上，才透出這一絲笑容。「大概今年可以舒一口氣吧!?」這是他們對道旁人詢問的答復。

我偶然得到一個旅行的機會，地區是合肥舒城幾縣，都是皖中地帶，也正是江淮區城裏的「谷倉」。四年未回去看一看的故鄉，也湊巧在這個區域內。旅途經過了十幾天，在故鄉又耽擱了八九天，這纔完成了「深入民間」之行。從老百姓的生活和言譚當中，體驗到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措施在鄉村的反應，眞是最接近事實的說明了。

從蕪湖搭內河小輪到巢縣，再換汽車到合肥，這是淮南鐵路拆毀後唯一的交通線。在我們剛要離開蕪湖的時候，會得到汽車在含山境內被刼的消息，爲着安全起見，纔改走水路到巢縣。船上飽聽船客們說着幾天來刼車的新聞，據說暴客們很有禮貌，在刼搜旅客的行李法幣以後，還集合失主演講一番，說明他們幷不是綠林出身，這樣做是酬答當局的整編盛意。這時如果有身穿制服類似軍工人員，那便不客氣地飽以一彈。這在他們也有理由，他們說「一碗飯大家吃，吃不成，咱們便拚。」這是何等憤激的刻畫!?

今年雖豐收 農婦仍多愁

從合肥出城，一百二十里到舒城，中間交界處有兩個大鄉鎮，一是花子崗，一是桃溪鎮。前者屬合肥，後者屬舒城。合肥的西南鄉，還不能算是瘠苦的地方，可是乾旱連年，勝利前受着敵僞長期的擾亂，游擊隊伍的游擊，勝利後散兵零匪的騷擾，雖然是豐收有望，依然醫不了村落殘破的創傷。我們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五里或十里，總要休息一下。休息地方，只有幾家所謂「店子」的茶棚飯店，水是黃得成了泥沙的化合物，入口鹹苦，飯是糙米，在棹上蠅蟲橫集的一兩盤鹹菜，那便是可口的佳肴。婦女是黃腫的面孔，蹣跚的脚步拖着正在乳哺的嬰兒。一兩個赤足泥垢的孩子們，正伸手向行客討錢。老太婆們以待死的眼光，望着路人，可以看出她們都是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的線上。不要忘記，這還是未受內戰炮火的鄉村啊！

勝利帶災殃 極目盡悽涼

桃溪鎮，這山環水繞的市鎮，在戰前，是米和山貨的吐納地。六安霍山一帶的生產品，經過這裏運到三河，從巢湖出口運到蕪湖。可是八年烽火，敵我的拉鋸，

把這一個豐裕的市鎮，也變成了瘡痍滿目。勝利帶來的災難，土貨滯銷，手工業奄無生氣，這街上幾家土蔴廠，也都關着門嘆氣！在暮色蒼茫中，旅行者進入口街鎮，觸目的都是「勦匪」的國軍，幾幾乎要宿門投止。

收租客一到　佃戶命完了

桃溪的茶館，還是不改當年，一早上便擠滿了。茶客多半是收租客，面對着赤脚泥腿的佃農，大談其今年田租的折扣成數。「今年是豐收了，東家也實在過不去，二五減租，祇有在陳欠上扣了。」收租客這樣地主張。「可是我們今年是外面好看呀！將臨秋收一場連陰雨，外灘的田畝，都變成湖泊。先生，你剛纔過渡來的地方，正是我們的田地呀！只有再懇情了！」佃戶這樣地哀求。旁邊人說話了：「大戶餘粮，還未了結，委購軍糧，你們府上還欠的很多，不問你們東佃怎樣講盤子，這點手續，請你老哥清掉罷。」像無情的鑽子，鍥入不幸者一羣的中間。旅行者不能等着他們談判結束，只好繼續登程。

地皆地主有　農民直如牛

從桃溪到舒城，這個荒僻的小縣，只有以舒席著名。城牆拆成了馬路，城內人家不到二百戶，可是環城綠樹，風景清幽，繞城的土地，都是種着蔴葉和靛青，農村副產品的收入，每每超過正項收穫所得。可是在那裏，沒有看見農民的經濟組織，沒有看見鄉村任何建設，原因是土地全屬於地主——城內的紳士階級，留在鄉村的都是佃農，不想也不能做點有意義的事業。

出舒城進到廬江的境界，經過的都是些圩田，正是秋水初泛的季節，道路被水冲壞的很多，一兩處橋漲冲斷，也沒有濟渡，便只有解衣渡河的一法。走到了柏神廟，算是大鎮，街上像止水一般的靜。少數商舖在半開門的狀態中，原因是正在農忙，無人上街。街上的病人很多，只有一個自稱西醫的走方郎中，忙着爲病人打針。打過針的人，手臂上多半潰爛，大概是針不消毒的原因。誰還知道他正是掌握人民生死大權的人呢？——其實鄉村裏都是這樣，並不止此一處。

無人怕當兵　祇怕綁與病

鄉村最使人感動的是農民的樸素坦白，他們的感情最容易表露，對環境的反應也最快，最直率。所可惜的是做政治致察的人不能和他們之間，建樹眞誠的了解；作爲一個還鄉遊子而又沿途訪問的我，便突破了這些隙礙，在他們和她們之間，進行自由坦白的說話。

首先他們傾吐對「征壯丁」的回憶。他們把征兵叫「拉壯丁」。說在去年以前還拉壯丁的時候，保長、甲長老爺是眞忙呀！今天張家請，明天李家請，只要不上冊子，什麼條件都可以，那個願意去當兵？爲什麼呢？他們會說，並不是怕當兵，而是怕綑綁虐待。王家莊子的王老大被拉去逃了回來，一個精強力壯的壯丁，變成滿身疥瘡既疲且黑的病鬼。許多人關在一起，六月炎天，不讓他們洗澡，一天兩頓稀飯，睡倒還要用繩子穿在一起。誰願意下這個活地獄呢？保長甲長的威風，在這方面最能表現，眞是予取予求，葬送了若干有爲的青年，使他們學會驕奢淫逸，失業之後沒有辦法生活。同時也破壞了若干良善的家庭。在勝利後征兵停止一年，農民離村的現象減少，今年收割期纔消除勞力缺乏的恐慌！但是「自願壯丁」，又似乎是在奉令徵集了。

鄉間多衙門　治安無人問

鄉村的組織，較戰前不同了，從前只有保甲長和紳董式的聯保主任，在今天，新縣制實行了，連保長也有了辦公處。鄉公所更是個像樣子的衙門，民政、文化、經濟、警衞各股之外，還有所謂鄉警——其實是從前民團鄉勇的變相。此外還有鄉丁保丁儼然是變相的差役，農民對於這些……只有一個印象，就是「要糧、要兵、要費款」。事實上，這些機關和人民間的關係，也只有這幾件事，其他的自治事業，在鄉村未看見也未聽見。天天喊着嚴密保甲，可是戶口的正確數字，鄉公所裏依舊沒有。保甲長之流，也並不會逐層遞査。鄉村裏治安還是依自然季節的情形而不同；收穫季節，土匪或偷竊較少，可是去冬今春，暴客們便常常光顧。我們一個本家，本來家道小康，就是經過不斷的搶刼而窮的精光。鄉下人說的好，祇有靠窮、跑、兩字應付。因爲窮，無可供給，暴客們對之不感興趣；能跑，更不致受到無

理的敲打。每到有匪警時候，鄉公所的鄉警，總是「保衛第一」，不敢下鄉，但捐費的征集則荷槍實彈而來。

七娘八老子 徵實禍又至

談到抗戰期間征糧的故事，那更一言難盡。鄉下人也報不出名目，眞所謂「七娘八老子」，不知從那一件說起。上年勝利後委賠軍糧，當時的官價和市値幷不甚遠，可是一再勸索，鄉保長壓在手中，不肯放出，只是無窮盡地逼迫人民交糧。各處糧價平地漲起，原來的官價不敷更甚，更無人願意承賠，來交的祗是些無權力，無地位之平民階層。現在中央停購了，省級淸理此事，出糧尙未拿錢，已收糧而又賣出，便宜了鄉保長，也增加了糾紛訴訟；這只是一個例。前幾年省政府在立煌，有一次爲敵寇攻陷，各鄉已存之糧曾命令散給人民領用，到勝利後，政費無出，重又追索。在廣江縣前任縣長某君，因爲挪用一筆經費，（好像是縣級公糧超支），竟異想天開地攤派下去，把已追的疏散糧扣用，抵到人民頭上，以致於勝利後一年的今天，鄉裏還在催「疏散糧」。像這一類的糊夾帳，鄉裏人怎能了解？又加之鄉保長新陳交替，交代不淸，更沒有辦法來澄淸這一筆糊塗帳。政府買怨，人民受害，歸結起來，還是「徵實」的德政！因此鄉下人聽到今年仍要徵實，眞是惶惶然如大禍之將至！

造產不造 造產捐倒要

自從抗戰以來，政府就在推行新縣制，最注重的地方事業，便是鄉鎭造產。立法的人確是「以仁心行仁政」。安徽幷曾宣佈過某一年度做造產年，縣預算上列入造產贏餘，舒城一縣即列收一億餘元。可是在鄉村看不出造產的痕迹。問保長，他回答你收益分存在民間。其實按照預算或計畫所列的數字，秋季按戶攤籌，冬耕的麥子收益如此，魚塘也是如此。總而言之，攤派而已！所以鄉下人祗知道是「造產捐」，而不知有造產，這眞是我們推行新政的一面鏡子！

剝削又剝削 殷實成赤貧

連帶着說到鄉村裏的攤派問題，又發現保甲長先生的籌款妙法。原來他們攤派索取，常趁着春夏之交，青黃不接，鄉下人應繳的費款，可以按照當時米價，作成實物，再加利息，變作借貸方式，由保甲長代墊，到秋間照收新谷。許多殷實人家，都因此破產，而鄉保長非法的所得，也祗能供給應酬浪費，農村財富，日漸消耗，漸漸只有富豪和赤貧兩類人對立在鄉村中，正是政治壓迫配合經濟擾亂的結果！

整個農村病 一言以蔽之

這些積極的摧殘之外，我們看看鄉村裏舊時的水利事業，和勤樸的風俗，都漸漸變態！塘堤已經是十幾年未修了，圩堤也只是東塡西補，縣城裏所謂建設科長，並不下鄉，只是坐在衙門裏，辦點文書工作。風俗呢，卻因爲保甲長容易發財，數量又大，引誘壞了多少青年？農民財富無保障，也不肯勤勞工作，節儉儲蓄。游手好閒的份子，日有增加，賭博竟成了公開的娛樂。教育者，沒有注意，也沒有多少教育工作，雖然是標榜着「一保一校」。

且看秉政者 如何謀改革

上面這一套，皆是實在見聞，未加絲毫藻飾。於此得到幾點感想：

第一、中國的鄉村，還是二十年前「貧愚弱」的狀態，而我們的政治建設能力卻更退化，今天以後，還需要從頭做起。

第二、鄉村在沒有戰爭烽火的地方，猶且如此，那末正在戰爭的地方，又當怎樣？中國實在需要和平，實在需要建設！

第三、人民不了解政治，而又沒有權力過問政治，才釀出今天基層政治貪汚的現象。民主政治，眞正的民主政治，是亟需普遍地實現了。

第四、農村的經濟，到了枯竭狀態，高利貸的魔手，控制住整個鄉村，而正當負農貸責任的銀行，走遍兩三縣，未見一處。戰前稍有規模的合作事業，也在農村裏退卻出來，儘管土地改革論者主張怎樣改進農村土地制度，可是高利貸的現象不消滅，無論地主佃農（當然大地主挾有資本者在外）皆要同歸於盡！這實在値得農業金融的主管當局愼重考慮的。

第五、治安不良，固由於經濟枯竭，而大量整編軍隊，編餘的官兵，不能消納在工商業的部門，任他們自尋生活，不止是地方秩序之隱憂，也是國家的大患。明末的裁驛站，會引起遍地流寇，現在又豈容忽視？

第六、政府上層的法令，總是不考慮到人民眞正的需要，例如鄉鎮造產一事，只能是一種經濟運動，現在却變做財政收益的目的，無產而要收益，釀成變相攤派，還說什麼地方自治事業？實在說，政府今天對人民管的也太多了！既是提倡自治，却不能容他決定自己的生產方式，強迫地忍受所謂「照案遵行」的法令，未免太滑稽了！

廿五、九、廿六、

蘭州秋色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訊）蘭州的秋天向來是天高氣爽恬靜得出奇的，但是今年却有些異樣。今年蘭州踊臨到秋天的邊緣，由於內戰的火星爆到了隴南，因而空氣大大地緊張了起來。自從七月中旬當地的報紙登載共軍李先念部沿陝南山地向內竄擾之後，以後報紙上的消息絕了跡，但民間的傳聞却越來越多了。接着是兵車的頻繁南開，共軍亦到達隴南兩當縣附近。在蘭州市上，軍警屢次出動大規模檢查行人，夜晚的戒嚴加強，特別是八月十五日前後，不知從那裏吹來了陣陣惡風，使得街上從下午兩三點起便十步一哨五步一崗，行人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謠言也特別多，據說在此期中頗逮捕到一些來歷不明的帶槍的人！

濃雲蔽月

共軍在隴南的聽說只有三四千人，沿兩當、徽縣、天水、清水各地向隴東方面的「邊區」潰退，沿途都有國軍尾追堵擊，被俘和流落者甚夥。據目擊者談：經過數千里流竄的這一股敗軍，飢餓、疾病、和風吹雨淋、狼狽得和告化子似的，走入村落，老百姓都逃避一空，糧食顆粒不見，他們餓極了，找到生長在地裏的洋芋之類，連土帶泥便放入口中亂嚼！

隴東「邊區」一帶的共軍爲了呼應，也曾「動」了起來，及到隴南的這一股匯合後，一切方才漸趨沉寂。經過了這兩月的驚擾，在陰歷中秋節的前夕，緊張空氣雖然已經散了，但濃雲遮蔽着中秋月，正如人們心頭仍留着一片陰影一樣。

補缺競選

正在這時節，却有一部分人正爲參政員的補選而奔忙着。有兩位本省籍參政員因參政有功而榮膺政府官吏，一任甘省府委員，一任田糧處副處長，因之這兩個參政員的遺缺要補起來。選舉用的是通訊方式，遠在一月之前，就有十人進行着競選攻勢。自然，這當中有人依附於黨，有人依附於團。「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各種方式的函電，雲片般飛向各縣，軟硬兼施，花樣繁多。這許多人中，有省委三人向各參議員推荐的一位頗爲人所注意，提起此君本無藉名，但其「老太爺」却來頭不小，爲炙手可熱之省府某處長。在九月一日開票的前幾日競選白熱化之時，有若干競選者觀望風色，或打了「退堂鼓」，或公開聲明讓賢，但有一二位却按捺不下心中一把火，於是在開票前日，傳單滿街飛，他們對某處長及其公子作頗不「親善」的「「恭維」，有所謂家族主義，私權主義，自生主義」等新鮮名詞，據說這是一個「社長」，以招搖撞騙出名諢號「流氓」者幹的。

選舉結果，某公子與人抽籤後當選，但纔之便發報表示「不應選」，甘省參議會開會，對辭職事又表示「不受理」，結果如何，不得而知。

武都猿人

另外有關學術方面的一件事也在前些日子引起了爭議，這就是「武都猿人」的問題。「武都猿人」自經甘肅科學教育館研究員王永焱先生在隴南武都發掘出一顆「人齒化石」和若干其他化石以後，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興趣。王先生今春繼續前往發掘，又得到若干犀牛頭骨、三趾馬、象牙化石等。內中有一個極像是人頭蓋骨的化石便大值得研究。因之有人發表「武都原（猿）人眞僞莫辨」一文，否定其爲猿人之頭骨。但發現者現在正在趕寫報告，他認爲這具頭骨可能係一龜殼，但證明猿人存在的證據應該不僅限於這一端。在國內外著名的攷古學家的鼓勵之下，大家都希望王先生能够作進一步的研究，及繼續找出一些更有力的證據來。

科學的研究需要的是極細密，極精確，及不可搖撼的論證。九月十三日渝大公報楊鍾健先生一文，對此問題已有透闢之說明。現王先生已於廿六日赴武都作第三次之發掘，猿人「身份」須看下回分解。

蘭大近訊

國立蘭州大學已經正式成立，這個包括文理、法、醫、獸醫四院的學府，正給人們帶來了若干遠大的希望。不過在目前，蘭大正面臨着一些困難：

第一是萃英門內的機關學校，除了參議會已經遷移外，另外的都沒有遷移的意思，以致蘭大新生的住宿上課都沒有地方。

第二是蘭大教授羣除了法醫二院爲舊人外，其他院系所聘之人尚有頗多困難。剛復員歸里的人士誰又願立刻卽赴西北，何況就連百分之廿五的邊疆待遇，蘭州也還不在範圍內呢。

目前舊生已上課，新生尚未完全放榜。

人民憂患

蘭州附近今年有一個無比好的收成，麥豆能較往年多兩三倍，正在災民肚皮尚未裝飽之時，徵兵、徵實、和徵借的消息，就把他們的希望掃得一乾二淨了。

一入九月，黃河又發了大水，十日以後便入了危險階段。洶湧的奔流，浩浩乎排山倒海而來，兩岸房屋搖搖欲墜，河中灘地被淹者數千畝，農民多已作必要的逃難準備，水勢實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幸好現已在逐日下降中。

黃河害人，野馬式的「漲價」也來踐踏人，這是外匯調整之賜。冬季快來了，但煤炭價格已經不能不令市民們咋舌了！

「瓜城」的一年一度的黃金時代已臨近了尾聲，「華萊士瓜」已殘，西瓜寥若晨星，林檎絕跡，只有蘋果，蘇木梨，肥甜的棗，正在蒙受人們的青睞。「元宵」已經叫賣起來了，秋意點染得近乎十分，但人們的心情卻與這高爽明朗的秋天配合不上！

（九月廿八日寄）

定戶注意

一　四千元定戶注意（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二　五千元定戶注意（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迎歡匯款續定。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悲劇世界之變遷

德國馬爾苦賽著
宗白華譯

新的世界不斷地產生。

巉巖峭壁底白頂，雪樹，一條灰綠的天；一湖黃碧的冷色，沉悶的單調的伐木聲節奏化了靜寂……一個世界。

十一月的霏雨籠罩着匆忙的人們，奔馳在暗淡的街燈下，奔馳在號叫的閃光裏，奔馳在發瘋的交通信號中……另一個世界。

千萬世界的總和構成那一個世界，那個我們一無所知，僅知它是一個矛盾的世界，彩色的合單調的，快樂的合痛苦的，理性的合無意義的——在一起。

當一個創造的人物把握它的時候，當他對它的存在底基本事實反應的時候，他把它窄狹化了；畫家把它寫成一幅風景，哲學家把它構成一哲學的體系，政治家計劃一事業的程序。每一個世界底創造者是肯定一件世界事實爲中樞，而將一切其它的世界材料環佈於這個「中心點」。

每一個世界底產生是强奸或否認這「世界底豐富」。有多少個創造的中心，就有多少個（片面的窄狹了的）世界。

構成這種「世界中心」的常常就是人類底「悲劇的生活經歷」。從阿希洛司（Aeschylus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到開撒（George Kaiser現代德國劇作家），從阿那西曼德司(Anaximandes希臘哲學家）到哈德曼（Eduard Von Hartmann 近代德國悲觀哲學家），千百年來曾經把人類的苦痛做宇宙基點。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物，對於苦痛有不同的表現法及詮解；然而這苦痛經歷底意義是不會變的。

所謂「悲劇地的」（Das Tragische）即是痛苦的生活經歷，然而普通的所謂痛苦，及一切不愉快的和阻礙我們的，還不就是「悲劇地的」。要使苦痛及阻礙不僅僅是暫時的、容易克服的刺激，而須是成爲「人的定義」之構成的分子，那纔是真正的苦痛。沒有這苦痛則動物不成其爲動物，沒有這苦痛則人不成其爲人，這是悲劇的基本經歷，這是各時代各語言的悲劇的底面的唯一的意義，赫勃爾（Hebbel德國近代著名悲劇作家）說過：『「悲劇的」必須作爲自始必然的，如同「死」，是與生俱來的，不可避免的。』

悲劇（Tragoedie）是「悲劇的生活經歷」底「客觀化」而爲戲劇，悲劇寫給我們看：這樣才是一個使人成爲一苦痛衆生的世界底眞相。

悲劇文學底內涵是變遷的：就外表說，是由於悲劇作家所見的具體的苦痛不同，實質上講，是他們自己所給與苦痛的詮釋不同。

希臘的詮解苦痛，是從宇宙的根源來演繹。苦痛是起於本無痛苦的神底自己分裂，他們固然以熱烈的情緒描寫苦痛的人類，但人並不是造化中特出的例外，生命底奇蹟，而却是這整個的必然的悲劇宇宙中一個必然的產物。

基督教的中古時期——那個一直到歌德，席勒，黑格爾的死的時候還有着影響的中古時期——是把苦痛安放進一個超苦痛的宇宙裏面，在天堂裏人沒有痛苦，在世界末日人也沒有痛苦。

沙士比亞和歌德以後的最近代作家是只訴說苦痛，他們是不詮解苦痛的意義，所以也不能超脫它淨化它，他們所描述的苦痛人生是孤獨地的，不復是宇宙底一肢體，他們不再寫「宇宙的悲劇」，像阿希洛司(Aeschylus)與席勒（Schiller），而只寫「人底悲劇」。

阿希洛司的悲劇因透澈地了悟神聖的命運而得減輕苦痛底重壓。

耶穌的受難及德國古典劇裏的英雄底死亡也能使着「超脫的確信」而得解脫痛苦，「不斷地努力者我們可以超脫之」（歌德浮士德中語）。

席勒說：『悲劇是包括那一些可能的事件，即一「自然的事宜」爲一較高的「道德的事宜」而犧

牲或「道德的事宜」爲一較高的「自然的事宜」而毀滅」。

但是這種悲劇究竟還可以說是「愉快的悲劇」，（譯者按因爲它的最後是超脫的）而與最近代的「悲劇的悲劇」及古希臘的宇宙悲劇相反。

席勒（這德國古典劇的代表）必須反對希臘的悲劇：『因爲這類劇本最後只是訴之於那「不得不然的」，而對於我們的理性底要求留下一不能解的糾結，但設若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爬上最高及最後的峯頂的時候，那動人的藝術也升高到這同樣的高點的時候，那時這種不可解的糾結也解開了，每一點不愉快的陰影也同時消散了。

「對於命運的不快既消失，且預感或明白地意識到萬物間的有意義的聯繫，偉大的秩序及善的意志，於是我們在那對於道德底調協的欣慰中同時產生對於偉大的整個的自然中「極圓滿的適合性」—愉快的觀念，而那些似乎破壞這諧和的，在個體事件中引起我們的痛苦的，反而能刺激我們的理性去向普遍的原理中求這特殊事件的原由，以消釋這大和諧裏底單個的不調。

希臘的藝術始終未達到這種悲劇情緒底純粹的高峯，因爲它的民間宗教和哲學都未能照燭到這點，惟近代藝術得享受那優點，即從一高明的哲學獲得較純潔的資料，乃可以滿足那最高的要求而發揮藝術底全部的道德的莊嚴。』（案此係指歌德席勒的古典文學而言）。

現代戲劇却比較地接近古代希臘而與這德國的古典文學異趣。兩者——希臘的與現代的——不知道所謂宇宙的解脫，赫勃爾(Hebbel)的戲劇最接近希臘，它同叔本華一樣，是一個徘徊於中途的，他還具有詮解世界底意義的意志，但在他的內部已經潛躍着「悲劇地的悲劇」——那不能達到解釋世界意義的悲劇。赫勃爾，如希臘作家，嘗試於宇宙之悲劇的詮解（案即解宇宙作一悲劇的過程），他認爲「單個的生命，設若不能僅守它的尺度，則不僅會偶然地成罪過，而是必然地本質地包括着決定着它（指罪過），如叔本華所見一般。

他的以下的見解眞正是希臘式的：『罪過存在於無節度中，但同時也因爲個體生命之所以無節度，是由於它本來的不完滿，沒有永生的權，而必然地趨向毀滅自己的工作，因此個體的罪過也獲着諒解——這種罪過是原始的，與人底概念不能脫開的……它不是繫於人的意志的方向，而是伴着人的一切行爲的。』

這也是屬於悲劇的本質，即悲劇的基本祕義是無法解釋的。

阿希洛司（Aeschylus）既不能解釋苦痛的來源，叔本華也未曾做到，『悲劇式的詮解也留下那原始的「不調和」不能解釋，並且把它忽略過，因爲它把那「罪體的」作爲直接的存在事實而肯定之，無論是否被創造的，卻不尋問它的第一因緣，所以它並非不讓罪過解脫，但未揭開罪過底內部根源』。

於是赫勃爾也同希臘作家一樣，不能達到悲劇的根本現象底一超想劇的解釋，僅能透澈人間悲劇底枝節，然而中古時代的宗教及德國古典文學的劇曲卻將那「悲劇的」放在一個非悲劇的宇宙秩序裏。

赫勃爾既像阿希洛司，但又像席勒一樣地寫「死底歡快」。他以爲「悲劇所達到的最高境地是滿足」Satisfication，即是由於一個人格以他的行動或他的存在因着反對一理想而自己毀滅，因而給與這理想以「滿足」（或賠償），但這種「滿足」有時是不完全的，設若那主角是反抗地蠅強懷恨地沒落下去，預示着將在宇宙另一靈頭仍然起來繼續爭鬥；那「滿足」是完全的，設若那英雄在失敗中獲着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底一清明的觀念，而在精神的和平中死去，這種淨化的愉快是赫勃爾同亞理斯多德及席勒所同感到的。

但赫勃爾究是褒希萊（Buechner 德國近代悲劇作家）同時代者，他繼續地說，『然而這第二項的滿足仍然祇是一半，因爲那「裂痕」雖然重復收攏了，但爲什麼必須有那裂痕？在這裏我始終沒有得着答覆，而且沒有人能得到，設若他認眞地去追問。』

赫勃爾的戲劇是緊密地站在「悲劇的悲劇」底開始，悲劇的悲劇是不再認識所謂「滿足」的，因爲它已不認有一宇宙的觀念，可以給與那主角以滿足的。

那絕對的悲劇的悲劇是……苦痛而無意義，無意義的苦痛是增高的苦痛，近代的作家才不給苦痛以意義。

對於亞理斯多德，悲劇是一心靈底淨化，歌德，雖然自己(對他的後一代而言)是一非悲劇式的人物，然卻有他的「狂飆與急迫」，克拉司地（Kleist 德國近代劇作家）及浪漫主義的文學家也經歷着「命運」，但害怕着——悲劇。

對於亞理斯多德悲劇是痛苦底解放，說出來了的，表寫了的苦痛可以輕減身歷的苦痛，因爲

它作爲有理由的，有意義的而寫出了。

對於歌德，這位站在基督中古時代底邊沿的，這位對於浪漫主義的邊防者，悲劇則是痛苦的照燭，苦痛的堆增，歌德有着對於悲劇的怯怕，雖然他的同時人黑格爾曾經寫着：「設若劇中主角所遭歷的必然的一切，能表出是絕對的合理的，而吾人情緒眞正獲得道義上的甯靜，這樣才表示出精神的解放（淨化）是悲劇底最後的目的，不是那痛苦與不幸：英雄底命運震動着我們，而靈魂裏卻是諒解。」

歌德心裏是瞭悟着，在悲劇裏震動是强過諒解，是超過解脫的信仰，只說出痛苦，用文字集中它，而不能由精神的控治減輕它一部的重担，那只是痛苦的增强。

或者那些希臘人在 Oreatie （希臘悲劇）演奏之後爲在和諧的激動中走回家，雖然我們不當忘記柏拉圖（Plato）在他的大著「共和國」中的判詞：「悲劇，不僅不能增進人的道德的修養，且降低他的道德，因爲本來應當鍛鍊他們抵抗痛苦與激情的，今乃培養他們的對於人類普遍命運的同情，使他們不只是對於這類情感，乃至於一切其他情感大開門戶。悲劇及喜劇的聽衆都得心靈受傷，雖最好的人也難以躲避它的壞影響。因爲我們在生活裏所難以克制的：一方面那過份的苦與愁的傾向，一方面那輕佻地嘲笑人生事物，都得因悲劇及喜劇的觀賞而增加這惡習，又因着所同情的是別人的遭受與苦痛，那受苦者反被詩人描寫作有價值的人，所以我們格外盡情地放縱我們對於苦痛的同感。但是別人的情況仍然可以影響到我們自己的狀態，而在習熟於對別人的苦痛與悲哀之後，我們的苦痛發生時也就難於克制。」柏拉圖的悲劇情調是超過亞理斯多德，他是亞氏的在各方面相反的人物，故而他以希臘人而反對悲劇。希臘的悲劇家是以悲劇來克制那「悲劇地的」。

理查第二（Richard II）的帝王命運，（沙士比亞的名劇主角）彭賽西理斯(Penthesileas)，是 Kleist 的名劇底主角）底戀愛狂。赫洛德斯（Herondes 是 Hedbel 劇本的一主角）底多疑，俄撒克（Woyzecks 是 Buechner 名劇底主角）底熱情，兩性底死的跳舞（是 Strindberg 底名劇）深刻地激動我們，但卻不能在我們心靈底緊張消失後使破裂的影響組成一和平的尾聲。（以上所列皆近代名悲劇）。

固然任何一種造型會給與甯靜，每一種創造的「距離化」減輕痛苦，儘管創造所以必需的緊張情緒先會增强痛苦的感覺，格拉柏(Grabbe)德國近代劇作家）說得不錯：「愛蒂那（Aetna 火山名）噴出了多量的火以後，是最爲安靜」。沒有積極的或模倣的創造才能則苦痛更不堪忍受，「創造」是屬於「人的定義」的一「極 Pol 」另一「極」就痛是苦。

但是：除掉這個痛苦之自然的「平衡化」而外，近代人生是未能將那「悲劇地的」化入一宇宙底意義秩序裏以超脫人在的苦痛。

從沙士比亞及克來斯地（Kleist）起開始我們的（近代的）悲劇，那「悲劇地的悲劇」•「悲那劇地的悲劇」是「人底悲劇」，不是宇宙的悲劇，而因爲這裏沒有「悲劇地的」之克服。只是一「狀態底」悲劇，不是「發展底」悲劇，在阿來司地Oreatee的經過中Ariden的詛呪滅了，在奧利安女郎(席勒的名劇主角)裏那背棄神聖使命的罪過也報償了，但東（Danton乃Buechner一劇本主角)的死，黑督曼(Hetmann 乃 Wedekind 的名劇的主角）的自殺，收賬員的逃進「自早晨到午夜」的世界裏，（George Kaiser的劇本）是開始與結局同時，悲劇的心靈唱完了自己……在一個世界裏，這世界只是他自己思想反省的世界，沒有獨自的存在。

現代悲劇作家，若在他的悲劇裏表現這世界而不以那悲劇的心靈爲主體，則必在他的劇本裏留下許多罅隙，裴希萊（Buechner）創造了最完滿的現代悲劇，因爲他將這悲劇的心靈張開得最大，現代悲劇不知所謂宇宙，僅僅宇宙底片斷，但是它認識這一個心靈，這個在一切宇宙底片斷中永遠反映着自己，因而給與那些宇宙片斷，一個統一，爲它（指宇宙）自己所沒有的。

基督教的和人文主義（歌德席勒）的悲劇以「最後的解脫的確信」超脫人生的苦痛，希臘的悲劇把人生苦痛放進全宇宙底意義裏，儘管是一悲劇式的宇宙意義裏，因而減輕苦痛的重担。

現代悲劇則僅是一「被造物」（衆生）（Creatur）底喊叫；不是苦痛的克服與減少：只是集中化與形象化，作爲對於「苦痛」最後的唯一可能的反應。

讀者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尾頁

三峽行

炎

十四日

　　船夫解纜的聲音，打破了我的酣睡，那時東方剛露出魚白色，而清[illegible]的槳聲一起，雲陽便漸漸地在視線中消失了。

　　太陽當頂時候到了奉節。沿岸停泊的木船極多，他們都說在「等水」。奉節卽古夔府，到宜昌還有四百里水路。這一段灘多水急，水淺時固然不易行駛，水大也就更加危險，所以許多船都在這裏等待水退。水究竟什麼時候退，誰也料不定，可能一「等」就是十天半月。幸而我們的船夫胆子大，飯後又匆匆啓碇東下了。

　　一會兒，船已過夔門，這是入峽的大門；兩邊高聳着削直的石壁，這種奇景，祗平日在畫中見過。一入夔門，水勢湍急，左右衝擊，形成無數漩渦。船行江中，有時跟着漩渦轉，一步也不能前進；有時被急流所推，衝向岩石，要停又無法可停。乘客都屏着氣息，不敢稍動。船夫們合力叫出單調而有節奏的聲響，但仍舊掩不住激流的怒號。

　　當船正與一個大漩渦相掙扎的時候，忽然有人喊出：「輪船來了！」於是全船更加慌亂。掌舵的叫我拿一塊白布，站在船頭揮舞。果然來的輪船立刻減低速度，在我們船邊擦過，幸未掀起大浪。

　　瞿塘是三峽中最險的一段，我倒私幸終能安全渡過，回頭看看那掌舵的漢子，也已汗淋周身了。

　　晚宿巫山，半夜明月從峯頭雲端擁出，使人撩起一縷無可言喻的情絲。

十五日

　　啓碇不久，卽入巫峽；這是三峽中最長的一峽，俗稱巫山十二峯；其中有金盤銀甲峽，鉄棺峽，都以象形得名。沿途險處不少，但較瞿塘爲緩和。遇有輪船，可先行靠近岸邊。上午十時過培石，一瞬間已由四川跨到了湖北境內。

　　飯後二時出巫峽。這時水面變寬，船行較緩。原擬宿巴東，但至香溪，天色已晚。香溪是一個小鎮，當時正謠言四起，十分擾亂。傳說鄂北某部共軍被國軍截斷，向香溪附近竄來。甚至大戶人家，已包好船隻，等待業時逃難。

十六日

　　船經過巴東，秭歸，都沒有停歇。沿途雖少名峽，但多險灘。看到沖破的船骸，眞是觸目心驚。記得從前經過西南公路，也看見沿途不少失事汽車，但亦未覺如此膽驚，大概因爲公路雖險，却沒有波濤這樣的大發索命！

　　同船的酒販要在毛坪卸貨，於是泊在這兒。毛坪與三斗坪相對，都是戰時新興的商場，但今日店家在半數以上都歇業了。

　晚間雷雨大作，涼氣襲人，加之船漏滿水，終夜未得好睡。

十七日

　　今日過三峽中最狹的西陵峽。出峽的地方叫南津關，寬不過百公尺，出關後便是寬闊大道，水面平靜，再無危險了。兩岸則有不少小販，駕着輕舟，兜售[illegible]，旅客船夫們經過辛苦風險以後，也樂得放懷一笑了。南津關水面既狹，所以薩凡奇設計的「揚壩安」水閘快擬建在這兒。水閘把長江分成兩段，閘內和閘外水位相差五六十丈，船過閘時要利用起重機，如果這擬議中的水閘眞的實現了，由重慶到宜昌千里之間，萬噸巨輪，便可通行無阻。在交通上，中國將有一個新紀元。然而爲古來多少詩人吟詠的三峽天險，也將大減聲色了。

引退的風度

　　行總署長蔣廷黻因行政當局之要求，提出辭呈，並於十月五日偕同新署長舉行交替儀式。蔣氏卽致簡短之別辭如左：

　　今日舉行儀式之主要目的，乃在使各位有機會與新署長見面，而在新署長未致詞之前，本人願略致數言，藉表寸心。年來總署及各分署同仁均曾爲行總工作之推行而盡最大之努力，並有不少犧牲，余謹此致謝。行總乃一規模宏大之服務機構，故參加行總工作者，必以服務精神爲本旨，深盼各位去除黨派政見之偏見，而繼續爲人類服務，若新署長歡迎各位繼續參加行總工作，則余深盼各位仍本服務精神，安心工作。李副署長曾與余共同計劃行總之工作，今渠既受政府任命，自將繼續行總之工作。以余個人而言，政府曾賜予以一爲人類服務之機會，今日各位既有爲人類服務之機，自應不斷努力，新署長工作經驗較余爲多，對行總工作自可勝任，而其成績定較余爲更好。（十月六日申報）

　　這是在中國所難得讀到的一篇好演說：簡短、尊嚴、而有風度。我們重刊這段演說的目的，僅僅是在使我們的讀者認識今日中國是如何的需要政治家。一個政治家所當磊落、灑爾、無所留戀，並不聲情衝動，政治家爲人而不爲己，爲公而不擇私，負責任的進，負責任的退。一個政治上的人物，特別在下台的時候，要坦然、冷靜，無所怨憤。我們所當提倡這種風度，學習這種風度。（靜）

負生偶記（五）

　　人謂蘇曼殊詩習龔定菴。今觀定菴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信然。予喜其「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温文。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一首。此爲別黃蓉石詩。他如「忽收古淚出長安」句中所用「古淚」字樣，亦有悲壯愴涼之致。

　　予三十以後，喜讀杜詩。歸國後寄居蜀中嘉陵江畔之柏溪。課暇每於清宵諷誦工部七律。子美亦居蜀甚久，今日由其詩中可以考見其當日之生活情況。「江漲」一詩中所云：「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川江水漲之情景，如繪紙上。沿江村落，例有三五人家，搆屋江畔；每當水漲之際，洪流湍急，茅屋淹沒。其狀況與子美所寫者正同。又「柴門不正逐江開」，「舍南舍北皆春水」等句，亦皆蜀中實況也。杜詩中又恆有「灘聲」字樣，曩在北京時，讀之不得其解；入蜀後時坐白木船，往來嘉陵江上，則所謂「灘」與「灘聲」，不解自解矣。益歎子美「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句之工也。而著一「轉」字，尤爲寫實逼眞，令人臨境神會之筆。蓋川江曲徊，灘流起伏，其聲固在「轉」也。

關於新疆

安平先生：

　　頃閱貴刊第五期「觀察通信」關「張治中獨籲西陲」一文，有云「繼主新政的吳忠信氏，爲人忠厚，尙欠韜略，加之幹才不當，致下屬胡作胡爲，多失人心。……」其言尙屬持平。吳氏爲人忠厚穩練，韜略雖嫌不足，然其在長蒙藏委員會任內，親赴西藏，不帶一兵，主持第十四輩達賴登座大典，成立西藏辦事處，加强藏胞內向之忱；考察甘、寧、青，推進中央政令於河西走廊，調處青甘駐軍，於抗戰期間遂臻之安定與團結，尙有足稱。至云「幹才不當」，吳氏幕中，幹才缺乏，確爲事實。然年長幕僚，大多缺乏近代政治眼光，青年新進，爲數極少。吳氏在目前植黨營私爭權奪利之政治場合中，尙不失爲一忠誠清廉之首長。惟嫌拘謹，又乏幹部，守成有餘，開展不足，至目前新疆實情，似不單純。張治中氏開展之局面，將來如何收拾，尙不可料，如最近中央之設立天山大學及改革新幣兩案，均以遭新省府會議反對而擱淺。九月廿一日上海大公報第八版所載之「天山南北」，均係實情。麥斯武德氏以特任監察使之尊，不居迪化官署，而借宿於蘇聯領事館，出出進進，果何所爲？歐民族自決自治者，卽如是乎？所以我們對於新局深有「總之實難」之感。我們對於邊疆看法，認爲不在個人的更張（不能說是絕對的），而在國家的決策，目前邊疆政治，自中樞主管邊政機構以至邊省地方政治制度，似皆有本孫總理民族平等，蔣主席宣示外蒙獨立，西藏自治，其他各盟區內民族政治經濟平等之原則，澈底調整，作配合新時代之邊政設施，方可著有成效。如仍承襲遜清理藩院已扮作風，爲現時蒙藏委員會的做法，（尙不及理藩院）則不僅邊政之廢弛不知伊於胡底，卽邊疆之完整，恐亦不無問題矣。敬頌

撰祺

讀者　最伊　敬上

（十一月一日）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 Electrique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膠皮線，鉛皮線，花線，堅性橡皮線，風雨線，紗包線，軍用電話線，幷製馬達，電話機，電表，以及其他各種零件，無不應有盡有，如蒙垂顧，不勝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廈二樓

電話　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　四七三號
電報掛號　DALCO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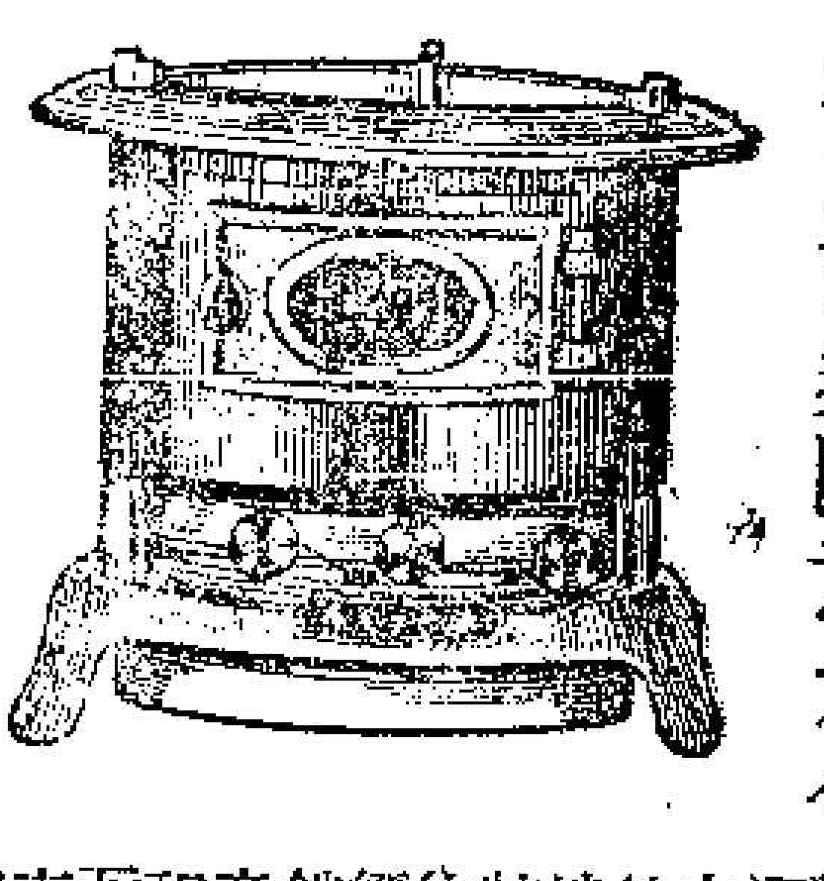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註冊商標

質地堅固
火力強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鷹球牌經濟爐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歡迎本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復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褚家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八二三三七